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二〇年第1期 总第26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 01 全球五大危机中国四大挑战
- 05 新冠肺炎疫情下 中国重启发展之道

聚焦中三角

- 09 六大保障举措 支持赣州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

探索改革

- 10 深圳创新外汇管控措施
- 11 国企改革加速破局 混改提档扩面经济广角

经济广角

- 13 海南自贸港建设创全新模式 开放探路不会冲击香港
- 15 数字化转型：“十四五”国企改革和发展的“新基建”

科教文卫

- 19 疫下澳门文化产业的危与机
- 21 农村题材剧：乡村的时代镜像与农民的精神史诗

三农问题

- 22 畅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 24 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 河南乡村振兴迸发新活力

社会观察

- 25 中国“地摊经济”的前世今生
- 27 新冠疫情与“斗而不破”的中美关系

综合治理

- 30 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 32 履行汞公约中国将交出怎样的答卷

环球视野

- 35 中国“新冠外交”的危与机
- 39 疫情形势下美国会为转嫁危机对中国出手吗？

学术前沿

- 43 专家专家解读《民法典》

讯息快递

全球五大危机中国四大挑战

白雪冰 香港《镜报月刊》2020年6月

当前，席卷全球的世纪大瘟疫新冠肺炎已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感染，近三十万人死亡，这场空前疫情呼啸而来，给全球经济造成致命打击。覆巢之下，已无完卵，2020年世界经济恐陷入近80年来的至暗时刻。

五大危机重创全球

一是失速危机。今年以来，伴随新冠病毒肺炎在世界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动荡不堪，疫情导致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中国、美国、欧盟三个最大经济体成全球最大疫情重灾区。为控制疫情，全球已有数十个国家关闭边境，多国宣布封城，空前管控之下，已导致经济大范围停摆，对全球政治、经济、贸易、金融等产生巨大冲击，美股此前出现史无前例的多次熔断，美国资本家倒牛奶现象亦再次出现，纽约原油期货5月合约价格跌到史无前例的-37.63美元之后，6月合约再遭血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全球经济将遭受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世界经济陷入停滞。IMF预测，假设多数国家的疫情和必要防控行动在第二季度达到峰值并在下半年消退，那么2020年全球增长率下降到-3%，比2020年1月的预测下调了6.3%，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情况糟糕得多。流行病危机造成的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计损失可能达到9万亿美元左右，大于日本和德国经济之和。今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为-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也将经历负增长。2020年增长率为-1%，如果不包括中国则为-2.2%，17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预计将收缩。

美国专家预测认为，疫情或持续一年至一年半左右，疫情延宕不绝下，各国金融状况可能更加恶化，全球供应链或进一步中断。在此情况下，全球GDP可能出现更大幅度下滑，2020年全球GDP可能比基线预测进一步降低3%；如果疫情持续到2021年，明年的增长可能比基线预测进一步降低8%。高盛的预测亦显示，全球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是金融危机的四倍，预计美国第二季度GDP年率下降11%，年化季率下降35%。

与以往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截然不同，此次危机系卫生危机、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多重危机叠加。事实上在疫情爆发前，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就已经走软。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就已多次下调今年明年世界各国增长预期，疫情带来的经济霜冻对已经处于下滑通道的全球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二是信用危机。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导致各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封锁了整个国家或城市，导致全球大部分经济活动陷入停滞。科法斯2020年第一季度贸易风险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致全球企业破产数激增至25%。法国外交部所属分分预测与战略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预测，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将遭遇破产，报告认为，新冠疫情催生的危机对非洲来说可能是难以承受的危机。凯投宏观警告称，新兴市场可能会出现一轮主权债务违约，随着借贷成本飙升，像厄瓜多尔、阿根廷和赞比亚这样的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他国家也可能遇到麻烦。

除了对新兴市场和不发达的非洲造成剧烈冲击外，新冠疫情对发达国家的杀伤力同样不可小觑。调查数据显示，作为美国经济命脉，小企业中有43%的受访企业表示撑不到6个月就可能会永久歇业，另外约有370万家小企业将在2周后停工或倒闭，这占美国小企业总数的60%以上。

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市场波动剧烈，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现在的利率已是零利率或负利率，除了采用非常规的量化宽松外，其他货币政策子弹已经不多，政府财政积累的负债率亦越来越高。经济学人智库全球首席经济学家Simon Baptist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全球各国政府增加支出以限制疫情蔓延对经济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出现债务违约。当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已陷入停滞，信用危机一旦产生将威胁到经济中的资金流动，进而蔓延到整个金融系统，更大量级的骨牌连锁效应不容小觑。

三是失业危机。随着疫情超预期发展，大量企业工厂破产倒闭，一场可预见的史无前例的失业海啸正加速席卷全球。国际劳工组织4月上旬就新冠病毒在社会和公共卫生方面所造成的破坏发出警告说，新冠病毒对就业的影响极大且无与伦比，该组织评估说，全球33亿就业人口中，超过五分之四受到工作场所完全或部分关闭的影响，在隔离措施和停工的作用下，大流行病导致供需双重经济冲击。

穆迪预测，在悲观情况下，2020年12月世界失业率或将达到10.1%，2021年3月达到10.6%。在正常情况下，到2020年底失业率为6.5%，到2021年3月失业率达到6.7%。数据显示，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在7周内累计达到3,300万，是过去50多年中最糟糕五周数值的12倍以上。市场人士指出，从趋势看，美国4月失业率会冲破16%，疫情最终导致的失业人口达到4,700万，是大萧条时期的3倍。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钦则预测，到今年夏天，美国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到20%，甚至更高。

随着疫情蔓延，失业海啸波及范围将越来越大，西班牙在3月中旬全国封城后，已经有逾百万人丢了工作。在法国，目前有400万雇员参加了政府针对新冠疫情危机而实

施的部分失业计划，占法国企业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

四是粮食危机。各国纷纷采取封锁政策，阻断了全球、地区及各国内部物资和人员流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的封锁政策使得供销网络承压，甚至有休克风险。更有国家和地区出于粮食安全考虑，采取了粮食出口限制措施，引燃全球粮食危机导火索。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发布题为《COVID-19:贸易限制是保障粮食安全最糟糕的应对措施》文章认为，疫情形势下各国对于食品供给已经产生担忧。

由于各国囤粮及交通封锁，全球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小麦和大米价格涨幅尤为明显。对于全球粮食安全风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早已在官方网站表态说，除非我们快速采取行动，保护最脆弱环节，保证全球粮食供应链通畅，缓解疫情蔓延对整个粮食体系的影响，否则我们面临粮食危机迫近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到2020年底，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将增至2.65亿人，比2019年增加1.3亿。有分析认为，疫情之下，食品支出占家庭预算比例较大地区将会爆发粮食危机，加之近期肆虐的非洲沙漠蝗灾，更增加了全球农产品供给的不确定性。

五是信心危机。疫情全球蔓延严重拖低了企业对于经济前景的展望。与此同时，公共活动推迟和恐惧情绪的不断加剧正导致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受到持续压制。受新冠疫情冲击，澳洲商业信心指数暴跌至有调查历史以来最低。德国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3月修正后的8.3降至2.7点，创2009年5月以来新低，显示新冠病毒疫情正在抑制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家庭支出。

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对经济的前景信心跌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悲观水平；反映经济活力的韩国消费者心理指数亦创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密西根大学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亦显示，当月该指数骤降至89.1点，为2016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区情况更不乐观，Sentix调查显示，4月份欧元区投资者信心指数从3月的-17.1跌至-42.9，创历史新低。Sentix董事总经理Patrick Hussy称，4月经济衰退的力度强于3月，情况较2009年糟糕得多，本轮经济衰退将持续更久，程度将更深。

中国经济面临四大挑战

五大危机笼罩下的全球经济所释放的二次冲击波，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承压巨大。概括而言，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四大压力和挑战。

一是增长压力。由于疫情的延宕以及演变的不确定性，将深度影响世界多国生产贸易消费和投资活动，所导致的经济活动冷却和金融市场动荡，令中国内外承压。从数据

上看，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表现远远不如预期，同此下降6.8%，录得新低。由于全球经济海啸所带来的二次冲击，即便后三季度通过全面复工和强刺激保持季均5%左右的经济增速，全年经济增速亦仅在1%至2%之间，远低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国内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测更为悲观，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会出现负增长。2020年是中国诸多目标面临兑现的关键一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脱贫、国内生产总值较2010年翻一番。其中欲达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全年经济增速须达到5.6%。疫情全球蔓延下，中国实现既定增长目标可谓压力山大。

二是外需压力。疫情剧烈冲击下，全球贸易增速正在急剧收缩，随着国外疫情的广泛蔓延和抗疫措施的不断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和负增长，中国全年货物出口规模下降20%左右或是大概率事件。1至2月中国出口规模较去年同期缩减17%，一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65,742亿元，同比下降6.4%。疫情发展对制造业需求构成二次伤害，导致3月新订单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尤其是出口新订单指数相较于疫情前水平差距甚大。除了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等防疫必要物资外，诸多外贸企业出口订单被取消，出口断崖式下降。而从疫情发展进程看，疫情海外扩散、各国封锁措施造成的经济压力在3月中下旬开始释放。目前多国已将封锁期延至5月，不排除考虑疫情发展继续延长的可能性，因此整个二季度中国出口将面临更大压力，特别是电子、纺织、仪表等行业。

三是产业链压力。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已取得较大成绩，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门类，超过220种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但席卷全球的疫情海啸，使得逆全球化和各自为政趋势加剧，疫后各国着手构建更独立完整安全的产业链或成为大势所趋，在全球产业链大回潮趋势下，减少对中国依赖或成为全球命题。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交叉，深度连结，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将对中国经济和产业链造成巨大打击。而在疫情出现之前，随着劳动力成本升高、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已出现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现象，叠加当下疫情影响可谓腹背受敌。

四是就业压力。初步分析表明，新冠疫情当前对中国就业形势已产生重要影响，失业(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总规模在1.5亿至2亿人之间。从就业总量上来看，全年就业压力较大；从就业结构上，大学生就业，服务业就业和外需相关的制造业就业压力较大。其中根据经济学家的预计，由于全球需求下降，今年中国可能有近3,000万的工作岗位发生流失，超过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2,000万。官方公布的2月份失业率从5.2%上升到6.2%，上升100个基本点，这是自2016年开始发布该数据以来的最高数值。相比之下，在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时，处于最高点时的失业率从找上升到

4.3%，仅提高了30个基本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20年来最严峻挑战，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下行压力不仅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超过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

经济何去何从唯有强力改革

此次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性影响可谓史无前例，需要决策层立足于短中长期的考虑，走好抗疫、稳增长和改革三者之间的平衡木。就防疫而言，中国应减少一刀切措施，在防止疫情二次蔓延的同时，降低一刀切对经济的冷却效应。就稳增长而言，由于疫情叠加经济下行，完成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殊为不易。实事求是降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至合理水平，营造相对宽松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有针对性采取有效调控措施，尽可能减少失业和对中小企业的重创，从而减少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

亟需警惕的是，不能因为疫情黑天鹅和经济负增长而忽视近年来已经出现得经济乏力走势，以及经济下行背后得结构性因素，包括市场化改革推进迟滞和要素条件恶化两大结构性痼疾，事实上就现时中国而言，通过标志性改革提振市场信心，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速市场化改革、提升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仍然至关重要。

未来，中国维持中高速增长动力的关键是加码要素配置体制机制市场化改革，无论对于危机中国抑或顺境中国而言，实质性深化改革都是最好的刺激弹药，以要素市场和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转危为安、危中探机。

新冠肺炎疫情下 中国重启发展之道

梅新育 香港《紫荆》2020年6月

确保我国国内经济和民生稳定发展，从来就是我们应对一切内外冲击、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自2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初步得到遏制起，复工就是中国疫后经济重启和社会生活正常化的关键。从2月下旬起，我就一再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并急剧转向、中国之外已成全球疫情扩张“主战场”且很有可能大面积失控的情况下，中国在保证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全面复工，已经成为决定此次全球抗疫成败的关键。因为中国本来就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出口大国，早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前就已经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且十多年来地位越发巩固，在此次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又成为率先走到疫情尾声的大国，因此是当仁不让的全球抗疫物资供应“军工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率先走到疫情尾声，是此次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的最大幸事。

在危机中奋进崛起的底气

从国际经济政治竞争的视角来看，长久以来，西方极端势力一直企图不择手段维护西方和美国霸权，打断中国发展势头。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这些极端势力毫不加隐晦地追求推动美国、乃至整个外部市场与“中国制造”脱钩，视之为逆转中国发展势头的关键，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敌视中国的势力又在竭力为此推波助澜。在此背景下，中国2月中旬以来的复工和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环境下的经济社会生活全面重启，更攸关整个国家、民族能否保持持续发展势头，最终鱼跃成龙，而不是就此戛然而止，甚至陷入起飞夭折的境地。

从经济周期长波来看，2014年以来，世界经济本来就已经进入低增长阶段并可能延续10年左右；在中美贸易战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双重打击之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显著衰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不能过度倾注于绝对增长速度，而应当将关注重心更多地转向相对增长目标，而且我国完全有可能在这场危机冲击中扩大经济增速相对于别国的优势，从而巩固、增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因为在宏观层次上，无论是国家，还是行业、公司，其增长前景绝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指标，更取决于相对指标。由于存在利益分配问题，危机时期各国绝对增长速度都在下降，有潜力的国家和行业尽管绝对增长速度也在下降，但相对增长却在加快，也就是说其增长率超过竞争对手的幅度扩大了，这样，在复苏时期就能够得到更大的份额，更多的收益。

10年前，国际金融危机高潮时，我就多次讲过这样的道理：比如说，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样的繁荣时期，中国的增长率有13%，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长率是8%，中国增长率比对手高5个百分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萧条时期，中国的增长率降到了8%，可能在国内外舆论界引起一片惊呼：哇！中国危机！经济增长率大幅度降低5个百分点！但这个时候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长率降到了1%，甚至是负增长，中国增长率超过对手的幅度有七八个百分点，比繁荣时期反而领先更多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提高更快了，在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中所得的份额更大了。

道理明白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这次重演以往在危机冲击中奋进崛起的底气何来？来自我国经济社会韧性强大的基本面，来自我们一骑绝尘、遥遥领先于其它经济大国和所有发达国家的抗疫实绩。

自2月26日海外每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越中国以来，全球抗疫的“主战场”迅速转向中国之外。我设定了“全民确诊率”和“全民死亡率”两项指标衡量各国/地区疫情严重程度，分别指累计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病例数占总人口比例，以4月16日24时中国疫情数据作为判断各国/地区疫情是否严重的标杆，整理计算了7组107个国家的疫

情数据。结果发现，截至北京时间4月16日24时，这7组107个国家中，共有82个国家全民确诊率超过中国，58个国家全民死亡率超过中国。盎格鲁—撒克逊“五眼联盟”加上日韩、独联体外的欧洲国家全民确诊率全部超过中国；除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的“五眼联盟”国家，韩国，除斯洛伐克、拉脱维亚、梵蒂冈3国之外全部欧洲国家全民死亡率超过中国；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国全民确诊率全部超过中国，除日本之外的七国集团成员国全民死亡率全部超过中国。而且，发达国家、其它主要经济大国全民确诊率和全民死亡率指标超过中国的倍数，往往是几十倍甚至百倍以上。随着疫情发展，全民确诊率、全民死亡率超过中国的国家日益增多，上述国家疫情指标相当于中国的倍数持续上升。

根据我国国内复工、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进展，根据海外疫情的这种发展情况，可以有把握地说，尽管我们受到了很大冲击，但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的趋势不变，而且还有可能加快。相信今年我们的出口绝对额即使比去年减少，但出口在全球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完全有可能明显上升。就像2009年我国出口绝对额减少，却由此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全面经济重启，一要借助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宏观需求，二是要做好产业发展和市场机制的秩序整顿与疏导。在调控宏观需求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应该围绕以下几点展开：要有助于推动帮助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技术新兴产业抢占前沿；要有助于让我们的已有的产业巩固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的“江湖地位”；要能够更有效地带动我们的消费；可以朝着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方向发展。

首先，抢占新兴产业前沿。特别是ICT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从这几年我走访了解的情况看，IT产业，像芯片，恰好走到了目前有利于发挥我们举国体制优势攻关的阶段。像芯片制造和光刻机等方面，目前正在逼近现有理论下的物理极限，在可预见的未来，新的根本理论创新一下子又出不来，对于领先国家而言，这种状况不利于它保持领先地位，但对于我们这种动员能力特别强、举国体制优势强大的国家来说，恰好是我们加紧赶超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往这个方向上投，这是更加积极有为。

其次，我国已连续十多年是全球第一的出口大国，但现在面临着考验，美国的极端势力想让外部市场和我们脱钩，我国又想保供应链稳定。我们怎样能够不但保住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最好还能够提升呢？这不仅仅是需要传统的竞争优势，还要利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巩固做强，发展转口贸易和过境贸易。基础设施不仅仅是国内直接的外贸使用，还让周边贸易伙伴的贸易也利用我们的基础设施进行，从而与我们

的经济体系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你想脱钩？我通过这些方面让你不能脱钩，反而和我们更紧密地绑在一起。

第三，近两年我走访了一些老房子、老小区的改造，我问了一下居民的情况，中部省份的大城市，基本上老房子改造之后，内部装修每家要花二三十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花在室内装修和换电梯上。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投资已经积累了大量固定资产存量，在推动老旧小区住宅改造方面，它不是原来的大拆大建的方式，而是更新改造的方式，它的推动实施是能够带动很大一笔消费的。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向上都要增加和扩大财政支出，相反，在某些方面，在已被证明是效率比较低、甚至是负效率、或者是该功成身退的领域，我们要收缩投资，这意味着要减少转移支付，优化转移支付形式。

为什么要减少转移支付？现行超强力度跨地区转移支付体制从1990年代中期建立实施，至今20余年，已逾一代人。当初要实现的目标已经实现，负面作用则越来越大。一个地方的产出不高，高度依赖转移支付，必然人为抬升这个地方的要素成本，使得产业发展不起来。同时，这个地方大部分经济资源不是靠市场竞争来分配，而是靠无偿援助来分配的，在这种分配体系下，聪明才智和自我奋斗精神不是优势，必然造成地方上整个人口结构、干部队伍构成的逆向淘汰和逆向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种情况。因此，我们需要适度减少财政政策转移，让原来受援的地区把重点转向吸引企业招商引资上来，优化招商环境，清理泛滥成灾的过度优惠，这也是比较好的。现在甚至有些生产面条和做牛羊肉的产业，也享受了高新产业的财税优惠，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从三个方面入手扩大内需

在扩大内需方面，国家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做：

一是发展二手商品市场，包括二手商品出口市场，为居民家庭购买新消费品、企业更新新设备消除障碍。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的一大障碍是大部分家庭大件消费品持有量已经饱和，很多企业设备也非常多，抑制了他们更新大件消费品或投资新设备的欲望。如能发展二手商品市场，让个人、家庭、企业能够更便利地对旧消费品、设备“断舍离”，他们更新新消费品和新设备的决心就会容易下得多。

二是投入更多精力拓展更新改造投资。总体来看，这些年来，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非常快，1980年到“十二五”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都是两位数，“十二五”之后的2015年跌破10%，2019年跌至5%左右。但是这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下降当中，有一个亮点，就是更新改造投资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在更新改造投资方面，遇到的障碍不少在司法和商业争议方面，我们要从这方面

来下工夫解决。

三是减少过多管制，降低投资门槛。我们不能搞过多管制，提高了消费和投资的门槛。这几年，我们一些政策对企业额外管制太多，以至于扼杀了许多企业的活力，而且消灭了很多本来可以有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一些过度的环保要求，给我们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对养猪、煤炭等产业影响尤其巨大，现在又不得不回过头来纠偏。希望我们不要重蹈覆辙，避免带来其他非常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经济与政治风险。

聚集中三角

六大保障举措 支持赣州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

陆丰 香港经济导报网 2020年6月8日

6月8日，赣州市委宣传部、赣州市发改委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支持赣州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若干政策措施》）。

发布会上，赣州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红敏称，支持赣州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和赣州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是建设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重大举措，对于示范引领江西全省对接融入国家区域战略，实现“作示范、勇争先”的目标定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刊记者关于《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出了哪些保障措施的问题时，她表示，《若干政策措施》重点从发展自主权、资金、人才、金融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强有力的保障措施。

一是赋予更大发展自主权。除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能下放或委托以及不具备下放条件的事项外，省级审批权限原则上均下放至赣州市。国家、省在财税、金融、科技、开放型经济、生态文明、社会资本投资等领域的改革试点优先在赣州试点。

二是加大资金支持。省级财政对赣州打造对接融入大湾区桥头堡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对赣州国际陆港开行中欧班列、铁海联运“三同”班列给予重点支持。支持赣州国际陆港符合条件的货运枢纽（物流园）申报国家补助资金。加大产业发展类转移支付资金倾斜力度，支持赣州积极引进大湾区电子信息和文化产业。

三是创新人才政策。支持赣州定向从大湾区柔性引才，打造对接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支持赣州人才申报国家重大人才计划，引导海外人才到赣州工作。在落实省“双千计划”“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远航工程”等人才工程和人才计划时，适当向赣州

倾斜，争取中组部在博士服务团选派时向赣州倾斜。落实创新创业有关政策，引导符合赣州产业发展的人才到赣州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兼职。支持赣州相关单位开展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试点。支持赣州加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并推动与大湾区相关机构合作。支持建设国家级公共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和职业技能竞赛集训基地，推动与大湾区职业（技工）院校合作交流，探索建立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

四是强化金融支持。推动创建国家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大对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赣州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发行园区建设、基础设施、物流、绿色、扶贫等专项和企业债。支持大湾区企业在赣州发起设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引导大湾区金融机构在赣州设立一级分支机构、后台服务中心。支持大湾区与赣州合作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建设金融小镇。开展应收账款、仓单质押等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

五是保障用地供给。支持赣州市建设 I 型大城市，加大省域副中心城市相关建设项目用地保障力度。每年下达赣州各县（市、区）新增用地计划，允许赣州市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统筹调剂使用。统筹省耕地占补平衡调剂库一定指标，支持赣州市对接大湾区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建设。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和引进的大湾区产业转移项目纳入省重大项目调度会，优先安排省级新增建设用地预留计划。

六是加强组织实施。省级层面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建设领导小组，由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省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发改委，统筹推进打造桥头堡和省域副中心城市等方面的重大政策和重大事项落实。建立合作机制，依托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推动建立江西与广东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支持赣州市与大湾区市县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

探索改革

深圳创新外汇管控措施

朱辉豪《香港商报》2020年6月3日

深圳即将在经常项下率先开展包括一项货物贸易项下和三项个人项下方便跨境资金进出的创新举措，旨在为企业对外贸易、个人用汇等经常项目跨境交易活动提供安全、高效的结算便利，相关措施已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同意。

货物贸易项下，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凭交易电子信息，为跨境电商和外贸综合服务新业态市场主体提供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措施针对新业态“小额、高频、电

子化”交易中结算成本高、收款周期长等“痛点”，提高资金结算效率，帮助小微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将从中获益。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家加大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背景下，深圳此举意义重大，有助于支持经济有序开放和健康发展。

系统性风险整体可控

个人项下的三项创新措施包括：一是在深圳市全面推广中资机构驻海外员工薪酬结汇的便利化试点，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解决了企业外派员工的薪酬结算的实际需求；二是对深圳市政府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外国高端人才，其配偶或子女为外籍人士或在境外长期生活的，便利其办理赡家款项下跨境汇款；三是对来深圳工作的外籍人士，便利其为随行子女代办境内就读国际学校学费结汇。

关于外汇储备消耗过快和借机走资的风险，宋清辉认为上述新措施存在这种可能。不过亦有业内人士认为无需过分忧虑，一方面虽然企业或个人结售汇的便利性和范围有所扩大，但相关的交易行为有迹可循，即处于相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下；另一方面，疫情之下，相应的换汇需求本身已大为减少，加上跨境资金有进有出，系统性风险相对较小。

国企改革加速破局 混改提档扩面

王璐 台湾 新浪网 2020年5月13日

备受关注的《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出台渐近，国资国企改革将迎来全面铺开的重要窗口期。《经济参考报》记者注意到，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提前谋划，近期实质性破局动作频出。其中，作为排头兵的混改蓄势扩面，多个地方和企业都已明确计划，大比例释放股权引资，甚至不追求控股权，市场化薪酬改革、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也将同步加大。与此同时，瞄准上市竞相发力，资本市场成为改革加速破局的重点关注方向。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是落实三年行动方案的第一年，未来相关改革动作有望保持加速破局节奏，深度和广度将超越之前，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

5月1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消息显示，作为第一批国企混改试点以及民航领域的第一家混改试点企业，东航集团旗下的东航物流递交IPO招股书，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而在青岛产权交易所，双星集团正在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并同步实施员工持股，打响了青岛国企集团混改“第一枪”。4月底，青岛市国资委将持有的双星集团全部股权划转至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这是今年二季度以来国企改革提速破局的一个缩影。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

言人彭华岗在此前的发布会上透露，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已经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正在履行审批程序。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出要加快出台。

据了解，今年是落实三年行动方案的第一年，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将在积极稳妥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大力推动专项工程等七大改革重点领域发力。

《经济参考报》记者注意到，五一前，继“双百行动”、“综改试验”后，又一国企改革专项工程——“科改示范行动”敲定204户企业名单，有138家央企子公司和66家地方国企入围。目前多个企业已经启动改革，从透露的方案来看，混改依然是重要突破口。

作为建筑工程类央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化学工程”）今年计划重点在6家二级公司、10至15家三级公司内有序推进混改，其中科改示范企业天辰公司计划以天辰高新材料研究院和天辰齐翔新材料公司作为试点，以出资新设公司方式进行混改，引入战略投资者，实行员工跟投计划。

兵器装备集团提出二季度要以抓好国家混改试点为突破口确保改革落地见效。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下称“国家电网”）明确今年将基本完成电动汽车、国康集团、通航公司、新源公司等二级单位混改。在信息通信、综合能源等新兴业务领域扩大混改实施范围。

地方国资委和国企的改革也呈提档扩面之势。安徽省国企改革三年实施方案正在制定，今年将选择1至2家具条件的省属企业推进集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合肥新桥机场产权多元化改革。

近日山东37家省属国企出台“倒计时”改革重点任务攻坚方案，重头戏混改被置于首位，例如兖矿集团年内混改户数占比达到60%，混改资产占比达到85%。山西的国企改革目标则是2020年“腾笼换鸟”净回笼资金100亿元；推进省属企业集团混改；推动75%以上的国有资本集聚到基础性领域和优势行业。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分析称，受疫情等内外复杂环境影响，或将有更多国企借助混改增加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发展。除了前期提出的电力等7个重要领域，目前混改也正在向民航等更多产业领域扩散。

国企混改加速扩数量扩领域的同时，力度也在升级。例如，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以产权转让方式引入1家战略投资者持有51%或100%股权。中国化学工程在保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将释放最高的股权比例用来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员工跟投。中国化学工程总经济师胡永红表示，三级公司混改将更加灵活，战略投资者如果在市场技术方

面能够带来更大更好补充的话，有的三级公司集团不一定非要绝对控股。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市场成为国企改革加速破局的重点关注方向。5月8日，国家电网首批金融资产上市工作完成，旗下上市公司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由“置信电气”变更为“国网英大”。下一步还将计划年内完成国网智能在科创板上市。

很多地方也列出了计划表。例如，安徽今年将加快推进淮南矿业集团整体上市以及华塑股份、国元农保、城建总院、皖垦种业等子公司首发上市。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昌明认为今年国企改革将进一步提速，可以预期深度和广度都将超越之前，以达到通过深化国企改革稳经济、促发展的目的，今后国企混改将越来越多与产业改革融合，如混改+电改，混改+军工改革等。

混资本的同时，更关键的是改机制。朱昌明认为，随着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国企混改越来越强化“改机制”的要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改机制”工作将进一步提速。

一位国企研究人士也告诉记者，市场化薪酬改革、市场化选人用人是今年国企改革工作的重点，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符合条件的企业要积极推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等政策。商业竞争类企业要加快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入推行分级分类公开招聘，在稳就业扩岗位的基础上，健全市场化用工制度，大力推行员工公开招聘，管理人员竞争上岗。

经济广角

海南自贸港建设创全新模式 开放探路不会冲击香港

伍敬斌《香港商报》2020年6月9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发布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部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专家表示，从目前的安排来看，海南自贸港有更低的税率，更为开放的投资准入和金融市场，这将吸引一批企业与外资落户。这对于海南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发展契机；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在国际经贸摩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既是中国探索进一步开放路径的方式，又是显示中国进一步拥抱全球化的重要举措。而对于东南亚邻国来说，中国将通过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和建设证明，相比于对抗，中国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

低税率将成最大优势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制度设计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6+1+4”。其中，“6”是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

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1”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4”是加强税收、社会治理、法治、风险防控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陈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对于海南自贸港，官方提得最多的就是自由与便利，而更低的税率与更开放的市场，是自由与便利的基础。可以看到，海南自贸港的税率相比中国其他地区来说很低。比如货物，是用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免税，这毫无疑问对于海南的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又比如消费品税，目前海南自贸港的消费品是按照正面清单的方式免税，范围尚不知多大，这一点更受人期待。且不管怎么样，正面列表的模式都要比现在的免税商店要方便多了，所有在海南居住的居民都可以享受。此外，海南自贸港将把企业所得税降低至15%，高端人才的个人所得税降低至15%，这已经与香港和新加坡相仿，都是重大利好。企业往哪走，取决于市场和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税率，很多企业或将愿意到海南去扩大生产。高端人才的去向也是一样，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降低，毫无疑问在吸引人才方面使得海南自贸港拥有重大优势。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表示，海南自贸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贸港，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不允许在意识形态方面来破坏社会主义的制度，不允许通过货物的贸易走私，不允许搞黄赌毒，不允许破坏海南良好的生态环境，不允许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产生腐败，不廉洁的行为。陈波认为，这六个“不允许”，可以视作一个负面清单，这意味?外商投资准入方面，海南自贸港可能要比全国其他的地区、自贸区更开放，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可以进入海南。

海南与香港定位不同

有人担心，海南自贸港将会与香港产生竞争关系。对此，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在发布会上表示，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重点突出的是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聚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培育具有海南特色的合作竞争新优势，为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海南自贸港与香港的定位不同，重点发展产业也不同，应该说互补大于竞争，不会对香港造成冲击。

陈波认为，金融方面，就目前的情况看，海南自贸港基本上能够取得跟深圳前海类似的这样的一种金融开放的地位。虽然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表态说要率先在海南自贸港实行落实金融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政策，但海南的金融基础太过薄弱了，市场也尚未成熟，金融业的发展还需要很长时间，未来海南自贸港的金融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方面与香港竞争几乎不可能。不过，香港的房租地租都很贵，人力也很贵，那么海南自贸港在这方面，可能会与香港有所竞争，具体还是要看税赋的减免程度以及正面清单的

范围。

陈波还表示，对于中国来说，海南自贸港是帮助中国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的路径。在国际经贸摩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疑虑，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将是一种新姿态，表明中国会坚定不移地继续沿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仍在拥抱全球化。此外，海南自贸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有一个极大的意义，就是对东南亚国家的表态。中国并不希望在南海搞对抗，中国真正想要建设南海，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在这个建设中获得利益。通过对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和建设，形成一个比较繁荣的海南国际岛，以此向东南亚的邻国证明，相比于对抗，中国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

数字化转型：“十四五”国企改革和发展的“新基建”

朱伟 香港商报网 2020年5月8日

2020年是我国“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的规划年，不料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困难和挑战。

抗疫进行时，国企勇担当。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平地而起，14家方舱医院快速建成；智能工厂紧急跨界转产口罩等防疫物资并发送全球；电力、能源、通信、交通、公用、粮油等领域的国企，全力有序保障民生和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凡此作为，举不胜举。中国速度、中国韧性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截至目前，97家中央企业、4.8万户央企子企业以及46万多家各类国有企业的复工率超过九成，认真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发挥着国民经济“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恰在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预测对中国经济前景表示乐观，2021年中国GDP增长可恢复式反弹式增长达9.2%。事实上，数字经济总量已占中国GDP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之一。中国信通院也预测，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或将达到60万亿元。前景美丽，现实严峻。我们在保持经受考验的同时，更应清醒地看到，新冠疫情这场全方位的大考也反映出国企在数字化转型层面的三大瓶颈问题。

第一，本次疫情反映出新基建需要夯实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地基，而数字基建等新基建则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地基。要建设好数字中国，就要提高数字治理能力，打造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政府的优先目标是“一网通办”，其关键是数据共享。目前看来，“一网通办”尚未形成闭环，而同样以数据驱动作为根基的“多网”——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仍处于融合进行时状态，尚未形成“一网通办、多网融合、网网通办、一网统办”的合力。5G绝

不仅仅是网速的提升，而是其他更多前沿数字技术大规模商用的加速器，从而掀起一场颠覆式的产业数字化变革和消费数字化革命，为每个企业带来一场全新的变局。埃森哲的5G市场调研发现，5G将带来的变革巨浪需要进一步不被低估，应用场景需要加速落地。

工业互联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设施，通过人、机、物的全面互联，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但目前我国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关键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在各行业的深度应用不足，创新生态也有待完善。埃森哲对中国企业的调研发现，掣肘因素主要来自于企业对应用场景认知模糊导致需求的不确定性、投资吸引力不足、缺乏外部合作、人才和组织四方面。

另外，伴随着能源转型、绿色发展以及个性化用户体验等需求，智慧能源等融合基础设施也有待加快发展。

第二，本次疫情反映出产业链和供应链需要固本强筋。

尽管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40多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全球化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但是此次疫情对“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超出了大部分企业的预期和经验。一旦在全球范围内有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中断，就会造成整个上下游企业的巨大损失。产业链供应链作为经济的生命线，其重要性前所未有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不仅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之举，更是着眼长远，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手段。

向高质量迈进的中国制造，需要以数字化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大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实现信息、技术、产能等精准配置与高效对接，从而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未来，产业链供应链将不再是上下游环节的单一或者单向衔接，而是向着更加多元复杂的生态系统转变。国企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龙头，需要在其中发挥开路先锋、引领示范、突破攻坚的作用，在全链条上促进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建立。

第三，本次疫情反映出国企的数字化转型任重道远。

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头部企业”，国企在此次疫情中做出了积极和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从顶层设计、架构建设、技术集成到运营维护，数据整合、分享、提炼、再利用、安全、管控等各种困难接踵而来。近期，埃森哲对中国1,012家企业的高管开展调研，有三分之二的受访高管认为难以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将数字技术转化为大规模的创新；而另一项研究则表明，有91%的受访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不足。

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投资和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不断减弱，而技术和数据的引领作用越来越强。前不久，中国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其

中，数据要素是首次以正式文件明确，技术和数据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新生产要素，也是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关键要素。

十四五规划契机对国企改革提出迫切要求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国企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顶梁柱、国家队，始终肩负着经济、政治、社会三大责任，其重要作用不可替代。国企当仁不让地要充分发挥在税收、GDP、就业人数、对其他类型企业的经济带动力等方面的长板优势，继续当好高质量创新驱动发展的领头羊，勇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而在此过程中，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十四五”国企改革和发展规划特别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新基建”。

我们认为，“十四五”期间，国企改革和发展的主攻方向有三个着力点。

一. 制度创新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必由之路。“十四五”期间，国企需进一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并把创新放在第一位认真落实。国企要想蓬勃发展，首先要实现制度创新，并以此带动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混合所有制是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企业运行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推进国企改革发展的主线。在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中国企业数量已达129家。其中，国企87家，平均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利润率分别为722.5亿美元、35.4亿美元、4.9%。国企具备了同跨国公司竞争的实力，但仍旧是体量高于质量、大而不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其目的是高质量发展，其手段是数字化转型，由此全面增强国企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真正做强做优做大，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二. 管理转型

国企改革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是必然选择。国企是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市场主体，在计划经济下，国企仅是行政指令的执行人；在市场经济下，国企必须转变为市场竞争主体。

只是“管企业”关注的是企业生产经营指标，容易导致企业盲目追求贪大求全；而“管资本”是更关注资本合理流动、优化要素配置，最大化地让市场引导企业追求发展质量和效益，适应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要求，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增强企业活力。

国资委数据显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户数占比已超过70%，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占比均超过60%，利润总额占比超过80%，国资委认为，国企已经进入了资产资本化、股权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对国有独资、全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用于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对境内国企的管理模式也已经不适用于“走出去”的国企。

为此，我们认为国企数字化转型亟需遵循市场化配置的原则。

三. 成本优化

绩效管理是国企改革的必须保证。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加强成本管理和绩效优化已成为企业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实现最佳收益的源泉。国企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仍会受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成本和绩效管理中存在管理观念淡薄、管理方法落后、考核指标不科学等问题，从而严重影响了国企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构建科学、可考核的成本和绩效管理体系，是国企提高成本和绩效管理水平、提升改革综合成效、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今年开始，央企经营业绩考核需深入贯彻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方针，在保留净利润、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3个指标的基础上，增加营收利润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两个新指标，形成“两利三率”新指标体系，引导央企更好实现高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在抓住主攻方向三个着力点的同时，我们建议，国企数字化转型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要处理好战略与执行的关系。数字化是一把手工程，而不是面子工程、献礼工程，更不是一锤子买卖。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最高战略，且必须反映在业务、运营和绩效考核的全流程执行中，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数字化已远远不够，而是要全方位数字化，实现数字化的决策方式、工作方式、合作方式以及客户最佳体验的方式。

企业数字化是一场真正的变革，一定是自上而下发生的。变革在高、中层管理者层面往往挑战最大，因为有很多固化的思维以及对自身地位的担心。但当一把手下定决心以后，以上率下，“头雁效应”就会显现。在具体实施上，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搭个大数据平台，买硬件、上系统就行了。而是“灵魂深处要改革”，基于全方位的数字化战略，从战略到运营，从前端到后端，从客户端到运营端，制定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调整组织架构，建立相应制度，转变公司文化和理念，使数字化转型一步步落实到位。

要处理好创新与能力的关系。在瞬息万变的数字化时代，封闭式的内部创新模式显然已经力不从心。“十四五”期间，国企需要打开创新的大门，打造敏捷、高效、具备成本优势且可持续的创新型组织，建立高度互联互通的开放式创新生态体系。巧用“外脑”，不断突破国企创新的边界，从而将消费者、供应商、合作方、行业专家和研究机构都纳入到自己的创新架构当中。国企应以更大、更快、更高、更强的开放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协作，才能最大释放数字化变革治理效能。

创新体系不仅仅是技术，构建数字化新动能也不能仅靠技术势能投资。技术要为人服务，而员工则要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协作以实现创新。数字化转型将极大促进国企

用数字技术赋能员工的需求，因此国企应投资于新的人才战略，建立柔性人才队伍，让企业更加有弹性、灵活性和竞争力。从用工模式的角度，柔性团队涵盖人机协作、项目型组织、内部人才池等多种形式。

要处理好交付与运营的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动态过程，没有休止符，要持续迭代，基于数据不断开发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并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智能运营。当数字技术渗透到企业的各个角落，持续快速的创新能力将成为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核心动力，助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不断稳步迈进。

实现智能运营的企业可以实时且正确地制定决策，全面整合人才、数据和智能化技术，推动流程转型并融入敏捷性和快速响应能力，不断提升用户体验并取得突破性业务成果。

国企应用数字技术打造智能工厂、协同经营、智能管理等全面数字化，可以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拓客、增收、打造全新的产业生态。只有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创新和智能运营，才能实现可持续的数字化转型。

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卓越伙伴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40多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长历史纵深、超广幅员国土面积、超高数量人口总量、超复杂民族宗教社会结构、和越来越超大规模经济总量的国家和经济体，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国企改革亦是如此。埃森哲根植中国、贡献中国至今已经33年，自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轮国企改革至今，见证、积极参与并助力中国特大型国有企业改制、全球化、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从战略到技术和运营的端到端的多个维度，为国企改革贡献了诸多智力和治理成果。

我们对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前景信心如磐。

我们愿与国企一起拥抱“十四五”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在加速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共进、超越、致远。

科教文卫

疫下澳门文化产业的危与机

宋晓冬 澳门人才网 2020年5月9日

受新冠疫情影响，澳门文化产业经历前所未有的打击。当下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短期生存危机，没有业务导致无米下炊。二是持续发展困惑，若暂时歇业、裁员或给员工放无薪假期，将可能面临人才流失，疫后难以重整旗鼓，进退两难。

文化消费券育素养

值得欣慰的是，政府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帮助居民和企业度难关。短期内依靠政府的财政援助是唯一也是最有效的出路。尽管各行业希望获得更多帮助，但从政府角度却很难就某个行业政策倾斜。在普惠制前提下，根据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精准施策，有其必要性。

一是发放文化消费券，提升居民艺术素养。为振兴文旅产业，内地多个省市和地区推出面向民众和景区景点、文化场所的文旅消费券、折扣券等。澳门可参考，向居民或在校学生发放文化消费券，用于观看文化展演企业演出。学校可号召家长带学生去看，并让澳门文艺演出机构和企业迅速复工复产，有利解决以往大多数演出的观众数量不足的问题。

通过文化消费券措施，特别是通过学生及家长的带动，有助培养澳人对艺术的认知和喜爱，为文艺展演市场带来长期的观众基础，有利行业长远发展。

海选深挖澳文创IP

二是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深入挖掘澳门IP。政府可充当采购商，让文产业界在疫情期间策划、制作关于澳门题材的影视、文学、音乐、短视频作品及文创产品，包括通过艺术手段对澳门街区的美化方案等，也可鼓励外部机构与本土企业合作参与。由政府招标或海选，每个题材选两至三家企业参与，艺术家个人也可报名。作品出来后，通过政府和创作者自身管道重点推到内地和港台、国外的大众传播平台播放。若点击超过一定数量，可给予额外奖励。

目的宣传澳门文化、历史、非博彩特别是未广为人知的一面，有助吸引旅客，令他们可有更多时间体验澳门，延长留宿，促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

此外，由于政府是这些作品的所有者，只要其中一部或几部优秀作品获市场认可，产生的市场价值和直接回报巨大。

当前内地最受粉丝欢迎的视频网红李子柒的市场价值已超过五亿。当年一出《非诚勿扰》电影，令海南三亚鸟巢酒店成热门景点，此后房价飙升数倍。

企业交功课促发奋

政府通过这样的投入形式来推介澳门、宣传旅游，与专门组织到世界各地推广。对产业促进来说，相比直接派钱，让大家“交功课”的做法更能让业界奋发图强，并令优秀企业、文艺工作者及好的创意脱颖而出。

三是策划举办更多大型文化体育赛事及交流活动。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得到各方面掌声，同时可能产生更积极的长远效果，就是认为澳门是安全的，到澳门会较放心，有

利策划举办一些大型、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育赛事和交流活动。如可策划举办澳门世界文化论坛，这次疫情引发的全球化问题、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话题、中医西医问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问题、饮食健康习惯问题，都需要一个场合系统深入探讨，究其根源更是长期文化文明冲突的结果。

办文化论坛此其时

中西文化交融是澳门的特色，由澳门来提早策划一个世界级的高水准的文化论坛正当其时，可同时融入艺术、美食、演艺、宗教、设计等元素，避免传统论坛的刻板僵化，体现中西交流、古今借鉴，开出澳门特色，对澳门城市形象的树立和带动文化及会展产业的发展将是大有裨益的。

博鳌因论坛而生，乌镇因互联网大会而起，办一次会兴一座城，澳门也需要一张城市名片。

此外，可策划更多国际性的体育和表演赛事，由文化团体、协会、企业等负责主办和承办，其成本由政府根据活动规模和支出按一定比例支持，以吸引活动来澳门举办，并确保主办单位不是单纯为获得补贴而举办活动。众多组织者和参赛人员来澳，将产生大量消费，媒体宣传及转播将进一步增加澳门知名度，令政府的投入通过另外管道产生回报。疫情进一步凸显澳门经济结构单一的脆弱性，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更迫在眉睫。文化创意产业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重点培育方向之一，有理由也有必要得到政府更大力度的支持与扶植，这对澳门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和人才素质的提高都非常重要。

农村题材剧：乡村的时代镜像与农民的精神史诗

香港 中评网 2020年6月7日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起伏变化，与我国农村改革和农民命运变迁的历史密切相关，也与国家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发展战略和电视剧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虽然在不同阶段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有所差异，也还存在不同层面的问题，但它以自身独特的关注对象和大量优秀作品描绘了几十年来乡村发展变迁的时代镜像，也摹写出了农民这一群体在改革开放中涅槃成长的精神史诗，在中国电视剧艺术长廊中闪耀生辉。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消除贫困发展目标的实现，农村题材电视剧在新时代也一定会迎来又一个发展的崭新阶段。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这意味着羁绊国人千百年的贫穷之根将被斩断。这对于我国的农村和农民而言尤其意义重大，因为贫穷曾经与他们如影随形几成标签。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因改革开放而兴的大众文艺样式，电视剧一直深

情关注农村，深入刻画农民，描绘了40余年来中国农村转折变迁的丰富多姿，也反映了广大农民在时代转型中精神升华的曲折艰难，将“写农民、演农民、为农民”的庄严承诺书写在数以千计的电视剧文本中，烙印入亿万观众的心灵，也为中国电视剧的艺术成就增添了特殊重要的色彩。

虽然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的故事就和农村相关，但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是中央电视台1978年5月22日播出的单本剧《三家亲》，该剧也是新时期电视剧发展的开端，与改革开放从农村出发形成了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映照。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题材电视剧开始集中出现并呈现出两种发展取向。一种是以揭露批判“文革”给农村和农民带来巨大伤害为主要内容的电视剧，如《葫芦坝的故事》《春回桃花寨》《放鸭童》等。另外，“伤痕”“反思”电视剧中的一些作品，如《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对农村的描写。另一种是以展现改革开放政策给农村生活和农民精神带来的新变化为主要内容，如《瓜儿甜蜜蜜》《春的信息》《吉庆有余》《山水一家人》等。电视剧中的这两种看似不同取向，实则具有一致性的内在逻辑，即对苦难过去的告别和对幸福未来的期待。其中流露出的乐观情绪恰好与知青大量回城的历史构成一种反向的叙事，表明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尚未能在真正意义上深入关注农村和农民。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村题材电视剧由事及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农民在这场历史性变革初期受到的心灵冲击与精神变革，从而诞生了《葛掌柜》《雪野》《神禾原》《山不转水转》《女人不是月亮》《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以及被称为“农村三部曲”的《篱笆·女人和狗》《轱辘·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这些作品不但描写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显著变化，更重要的是深入描写了农民在面对发家致富的现实追求和新的现代价值。

三农问题

畅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香港中评网 2020年5月15日

发展农村电商，必须畅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不久前，一条历经6年自主研发的首条智慧物流快线(智运快线)在广东茂名化州正式运营，主要承接当地快递接驳、产业扶贫、商品配送等业务。从试运营第一天运送8件快递，到今年4月份月运输量猛增到3000余件，持续增长的势头，展现出物流畅通对农村电商的推动作用。在现场采访发

现，智运快线由三个基站、低空索道、穿梭机器人、自来物仓配系统、中央智能监控系统等部分组成。在一侧的穿梭机“装”上蔬菜、番薯、石榴等农产品，就能从村基站沿着索道快速驶向镇基站；而在另一头，另一架穿梭机从镇基站同步赶到村基站，“吐”出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一件件包裹。过去，村民网购还得来回奔波，如今不仅购物更方便了，农产品出村也更容易了。手机上接到农产品订单，村民就可以马上去地里采摘，然后交给智运快线，由快线负责发往订购者，极大地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激发乡村经济活力，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物流问题。现实中，农村物流往往体量大、货物重，但单价低、数量小、频次少、收发地点分散。很多快递公司基于成本考虑，设点大多只到乡镇一级。快递到不了村，村里的农产品出不来，乡村物流堵在了“最后一公里”。基于这种情况，国家邮政局在《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到2022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的要求，智运快线的上线为实现“村村通快递”进行了探索、创造了条件。比如，在广东茂名，农村智慧物流快线以县为单位，构建起“县—镇—村”三级网络，实现1小时到货目标。可以说，本着“投资省、建设快、占用资源少”的原则，新型智能化、轻量化、小批量、多批次的运输系统在农村具备操作条件，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也可以推动物流高效运转，从而实现“随时发、准时到、速度快、成本低”的效果。从长远来看，“村村通快递”不仅能够提升农村物流效率，降低流通成本，而且有助于推进邮政业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久前，商务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工作的通知，提出统筹电商、邮政、快递、交通运输等企业农村网络资源，鼓励企业加强合作，推广集约配送、共用网点、统仓统配等模式，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抓住乡村物流建设这一“牛鼻子”，充分挖掘潜力，就能更好激活乡村经济、推动乡村振兴。

在操作层面，虽然乡村物流需求量大，但如果每一个自然村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物流系统建设，难免重复建设，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引导，推动科学布局。无论是补贴乡村物流运输成本还是架设运输系统，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参与建设，企业的参与意愿不高，投资也可能产生不均衡的情况。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能够统筹规划、实现科学选址，形成发展合力；另一方面也能强化保障，让位置偏远的地区享受到现代物流服务。

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是实现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管理、统筹布局，覆盖农村的物流网络就能有效运转，为美好生活增添亮丽色彩。

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 河南乡村振兴迸发新活力

张坡 香港经济导报网 2020年6月11日

6月11日，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县域强音”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南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强调，要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为县域治理指明了方向。河南省委、省政府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农村人口大省的实际，坚持把县域治理与乡村振兴一体谋划、一体推动，在产业发展、生态宜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乡村产业快速发展。粮食生产优势进一步稳固，河南省粮食生产实现“16连丰”，粮食总产站稳了1300亿斤的新台阶。畜牧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加快生猪、肉牛、奶牛、家禽、肉羊五大优势产业发展，肉类、禽蛋产量稳居全国前二位，奶类产量稳居全国前五位。农产品加工业加快转型，抓好面、肉、油、乳、果蔬五大产业，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稳居全国第二位。全省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163.75元，同比增长9.6%。

乡村生态不断改善。以环境修复保护促进“生态美”，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加快森林河南建设。实施“四水同治”，建设十大水利工程，持续推进黄河“清四乱”行动。以人居环境改善促进“生活美”。以县为单位开展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全面开展村庄清洁行动，85%的县建立了城乡一体化保洁机制，9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23%，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1%。以农业循环发展促进“生产美”。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4年负增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9%，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8.9%。

乡村建设更加宜居。积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着力解决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产生活问题。农村交通更加完善，10个县成功创建国家“四好农村路”示范县，行政村通硬化路率、通客车率均达到100%。农村饮水更加安全，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基本实现全覆盖，全省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89%，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8%。乡村物流更加便捷，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企业及“四通一达”物流快递企业均在县（市）设有物流网点或区域分拨中心，并逐步向行政村延伸。农村宽带网络更加普及，实现20户以上自然村4G网络全覆盖，农产品网上销售额达370亿元。

乡村活力加速释放。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一步巩固完善，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重点放活土地经营权，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占家庭承包面积的比重达到6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已全面完成，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19万家、数量居全国第2位，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合作社超过1.1万家；家庭农场发展到5.76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8.8万个。

社会观察

中国“地摊经济”的前世今生

王向伟 香港 思考HK 2020年6月15日

多年来，城市街边小摊和流动商贩备受诟病，被视为不上档次、有碍观瞻。在管理者看来，他们不过是混乱和落后的代名词，卫生条件差、噪音污染大、产品质量次和交通秩序乱。时下之中国，正自信满满地崛起成为富强之国，且以科技进步和林立的摩天大厦为豪，这些显得格格不入。

在城市里，城管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驱赶街边摊等小商小贩，而城管所采用的粗暴手段，经常会引发争吵，甚至导致大打出手，城管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最不受待见的公务员。

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高调为地摊经济站台后，路边摊位和流动商贩过去几周里出现了“报复性”反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经济毁灭性的影响，是地摊经济重获支持的催化剂。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数千万人都面临失业的危险。

然而，围绕地摊经济展开的激烈争论却富含深意。争论焦点集中在6亿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生活困境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借助经济实力扩大中国海外利益之时，这些问题就更引人关注了。

在提振经济的优先项及投资安排上，中国领导人进行着内部讨论，因此这（鼓励地摊经济）也有其政治含义。比如说，北京和深圳等大都市已宣布，李克强总理提出发展地摊经济的建议，不适合它们城市地位和发展战略，将不跟进实施。

在多数中国人的记忆里，满街地摊这样喧闹无序的场景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产物，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事。令人意外的是，在上月末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愉快地回忆了改革开放之初，街边经商活动给广大青年找到了谋生门路，并赞扬西部有个城市设置3.6万个流动商贩摊位的决定，称这一决定一夜之间就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

李克强还透露说，虽然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3万元人民币（约4,200美元），但仍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这样的收入在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从几个方面看，李克强这番话意义深刻。

中国总理每年都会人大会议后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央视对发布会进行全程直播，因此所讲内容都会事前有所设计，基本是照本宣科。记者和普通民众都会对总理讲话详加分析，试图从中了解政策风向的蛛丝马迹。

李克强总理公开表态支持地摊经济，立即引发了一场全国热议和响应。长春、南京和长沙等几十个城市已出台相应措施，鼓励发展地摊经济。本月初，李克强总理到山东青岛视察时，再次为地摊经济站台，主动与摊主交谈。这一新闻在央视晚间黄金时段节目播出后，再次点燃了对地摊经济的热情。

李克强总理对地摊经济的高调支持，彰显了中国领导层对严峻就业形势的担忧。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新冠疫情更是令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中央已把稳就业列为第一要务。据官方数据，现在的失业率为6%，但这一数据只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因此远远不能反映全国的实际情况。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国有数千万流动劳动力在城市找不到活干，已不得不返回农村老家。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去年12月首先在中国爆发。在疫情得以控制之后，中国多数企业已复工复产，只是远远未开足马力，尤其是那些出口型企业。鉴于疫情仍在世界各地肆虐，中国出口型企业的订单大幅下跌。

6月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委会，部署支持出口型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开拓国内市场，以帮扶外贸企业渡过难关。目前，全国外贸型企业雇工总数近2亿人。政府还面临另一艰巨任务，即为870万高校毕业生创造和寻找就业机会。

同时，李克强在讲话中还突出强调了6亿低收入人口的艰苦生活，这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共鸣。多年来，公众对这部分人的生活困难的关注度远远不够。

这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其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近100万亿元（约14.4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882元（约10,276美元），首次超过1万美元大关。据联合国的定义，中国已迈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其二，中国划定的贫困线是年收入低于3,218元，但依据购买力平价，中国的贫困线高于世界银行划定的国际贫困线，即每天1.9美元。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从2012年到去年年底，中国贫困人口从9,899万减少到了551万。习近平主席已作出庄严承诺，到今年年底完成脱贫攻坚目标。然而，也有人担忧，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一些已摆脱贫困的人可能会再次陷入贫困。

在脱贫攻坚占据各媒体头条之时，李克强总理强调了经常被媒体忽视的6亿低收入人口的困境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对此大加赞扬。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强劲发展，中国官媒及国际媒体都关注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目前中产阶级人口约3亿。

而现在，由于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如何助这6亿低收入人口一臂之力，似乎比消除绝对贫困更具挑战性。

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永久放宽对街边地摊的限制，而不是作为应对疫情的一时之策。经济学家周天勇表示，如果城市放开地摊经济，可解决5,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但内部对此有不同声音。李克强倡导的地摊经济遭到了北京和深圳等大城市的强烈抵制。这些地方政府表示，他们不打算放开对街边摊位经营活动的限制。《北京日报》在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中称，地摊经济并不适合北京的定位，而且北京也不允许那些造成街道脏乱、假冒伪劣、噪音扰民、堵塞交通等问题的经营活动卷土重来。

新冠疫情与“斗而不破”的中美关系

王向伟 香港《南华早报》2020年5月4日

长江是中国重要水源地，其水质关乎数亿民众健康。随着长江经济带快速的工业化进程，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不仅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理效应，且易产生耐药性，降低人体免疫力。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会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国际秩序，各路专家学者观点不一，同时对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也把握不准。然而，在对一个关键问题的判断上，他们似乎观点一致，即中美关系正每况愈下。自疫情大爆发以来，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较量就从未停止过。

前景不容乐观。但如果把相互高度依赖、复杂无比的中美关系简单定义为非黑即白，显然也不切实际。我的观点有点儿不同，即事情并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中美是在相互竞争，争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主导权。

新冠疫情已致20多万人死亡，并重创全球经济。中美并未抓住机会，联手主导这场全球抗疫斗争，反而展开了一场危险的相互推诿游戏，指责对方错失防控良机以及防控措施不力等。

在这场甩锅大战中，华盛顿似乎占了上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批评试图污名化及挑起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后，不再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华人病毒，但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一众高官及对华鹰派人物，仍在大肆攻击中国，指责中国隐瞒疫

情及散布虚假信息，并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以中国为中心，因此还暂停为世卫组织提供资助。

密苏里州已把中国政府告上法庭，指控中国政府掩盖真相，并指责中国在阻止病毒传播上做得远远不够。密西西比州也表示将采取类似行动。另据报道，美国会议员正在制定数百项针对中国的法案。

据美国媒体报道，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是此项调查开始15年来持负面观点比例最高的一次，比特朗普2017年入主白宫时高了近20个百分点。目前，距离美国大选只有6个月了。毫无疑问，中国会再次成为共和民主两党竞选时攻击的靶子。

北京也在试图把责任推向美方，认为是美军军运代表团把病毒带到了中国。虽然这一阴谋论推销并不成功，但中国也在积极反驳美方的指控，抨击蓬佩奥及其他官员，指责他们满口谎言，散布针对中国的政治病毒。4月27日晚间，黄金时段《新闻联播》节目在一篇评论调高了抨击蓬佩奥的调门，首次将他称之为人类公敌。

随着中美双方抨击对方的调门越来越高，分析人士和商人感到担忧，担心这可能会导致业已紧张的双边关系进入全面冷战，甚至可能会在南海问题上擦枪走火，爆发热战。目前，中美军舰都在南海海域秀肌肉，大有冲突一触即发之势。

这些理由足以令人悲观。但也有理由表明，虽然双方口水战升级，但北京和华盛顿还远远未到爆发冲突的时候。

首先，虽然北京启动了宣传机器，反击华盛顿的论调，但非常谨慎小心，以免造成双边关系失控。正如一位官员在谈到大国关系时所言，中美之间是斗而不破。例如，中国官员和官媒对蓬佩奥及特朗普的顾问纳瓦罗等其他对华鹰派人物可以进行猛烈抨击，但在批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或涉华言论时，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不直接提及特朗普的名字，而是称之为美国领导人。

来而不往非礼也。特朗普及其内阁高官在抨击中国政府时也特别谨慎，从不提习近平的名字。不久前，特朗普仍公开表示，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

也许有人会窃笑，但事实就是如此。从高官到医疗专业人士，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一直保持着畅通的沟通渠道。

3月底，习近平和特朗普通电话，双方承诺将加强疫情防控合作。至于蓬佩奥，他被中国官媒骂得狗血喷头，甚至被称为人类公敌，但他也曾两次与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杨洁篪通电话。包括纽约州长科莫在内的一些州长，也一直与中方官员保持联系，以确保能采购到急需的医疗物资。

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供的数据，截止4月24日，中国已向美方提供了将近35亿个口罩、3亿副手套以及5800多台呼吸机。这些医疗物资多为商业采购。中国一些知名富豪和企业，出于对双边关系恶化的担忧，也向美方捐赠了大批医疗用品，这就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蔡崇信。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现在是《南华早报》的老板。很多美籍华人以及在美国留学生也在尽力从中国及其他地方大量采购医疗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同时，中美医学专业人士和科研人员就病毒来源、疫苗研发和新冠信息共享等展开合作，只是媒体对此报道不多罢了。

随着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全球化进程急刹车，而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待全球经济重启、业界对供应链重新审视之时，一些业界脱钩行为将在所难免。

然而，美国大企业对致力于中国这个大市场依然立场坚定、初心未改。最近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企业没有因疫情而撤离中国的计划。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与普华永道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近70%的受访美企预期其在华供应链业务将在3个月内恢复正常，96%的受访者预测其在华业务将在3到6个月内回归常态。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加码了吸引美国投资者的魅力攻势，承诺将进一步对美国投资开放，而且政府高层也频频出面，给足了美国商人面子，让他们觉得在华备受欢迎。

4月底，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出席了埃克森美孚在广东惠州投资高达100亿美元石化项目的开工仪式，埃克森美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伍德伦在达拉斯市通过视频联机的形式出席了开工仪式。伍德伦满面笑容，盛赞项目体现了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创新s的坚定承诺。中国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对这一开工仪式进行了突出报道。

此前，美国咖啡连锁企业星巴克3月宣布，将投资至少1.3亿美元，在江苏省昆山建设咖啡创新产业园。项目将是星巴克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生产基地。中国官媒对此予以高调报道，并突出了李克强总理的贺信。李克强对星巴克致力于中国市场表示赞赏，并承诺中国将扩大对外开放。

国际媒体大肆渲染中美在贸易和技术、南海和台湾问题上的竞争与对抗，但为了地区和世界稳定，在其他重要地缘政治问题上，两国还必须合作。

朝鲜问题就是最新例证。关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健康状况和行踪，各种猜测和消息满天飞。这就迫切需要北京和华盛顿进行合作，以防止因朝鲜领导层危机而产生恶果。如果中美在此问题上不合作，将会给地区稳定带来严重影响。

另一例证就是中美贸易协议。由于新冠疫情，该协议的履行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分析人士认为，协议有可能会成为一浪高过一浪对华敌对情绪的又一牺牲品。

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中美更应积极行动，确保来

自不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这么做不仅有其经济利益，也会给双方带来政治好处。

对特朗普而言，中国大量进口美农产品和其他产品，不仅能帮助美国提振经济，还有助于他取悦选民。而对中国来说，协议履行将推动经济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从而提振国内经济。

综合治理

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香港商报网 2020年5月15日

城市治理体系转型重构成为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议题。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数量1.7亿，占总人口的17.92%。至2015年，城镇人口数量超过7.7亿，占总人口比例为56.10%。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日趋迫切。

加强城市治理研究

日益多样化、动态化、复杂化的城市治理问题逐渐超出了传统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阈值。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唐皇凤表示，过快的城市建设导致城市规划科学性和总体性不足，部分大城市人口和产业过度聚集，进而引发诸如交通拥堵、社会焦虑等城市病。

“快速城市化需要根据城市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来思考城市问题。同时，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也给城市管理的内容和方式带来了创新的要求。”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佃利对记者说，城市的集聚性和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既要求提高城市整体竞争力，又要积极响应现代社会的多元需求。尤其是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发展，既对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可能。

“城市发展既要基于城市的历史基因，又要注重城市的未来愿景，将昨日之城、今日之城和明日之城的宏大历史视野贯穿于城市治理实践中。”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夏志强认为，城市治理有其独特的治理对象和目标，也需要独特的治理方法和工具，因而有必要从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进行总体谋划和专门研究，找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

在王佃利看来，研究中国的城市治理，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研究城市治理主体的定位、

作用、关系。他表示，深入分析和考察中国城市治理模式中各种合作机制，是一项细致又重要的任务。在重新定位政府职能的基础上，需要关注三个方面：城市治理的对象，要从单纯的发展城市经济到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协调发展，增大城市社会的整体福利；城市治理的主体，要实现从政府的单一中心管理到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主体共同治理；城市治理的目标和绩效评定，纠正以往偏重经济绩效的考核，将城市居民文化素质、环境等多个因素纳入考核体系。

实现城市智慧治理

王佃利表示，构建适合中国城市情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要秉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原则，让党建引领建构社会团结的核心和凝聚力，通过政府主导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利用社会协同来激发社会的活力。

在城市治理中，完善公共服务，强化城市发展支撑和可持续能力，弥补公共服务的短板；使用好信息化技术，提升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增加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协商的能力水平，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范式，精细化治理是对传统粗放式、经验化治理模式的反思、批判和超越，代表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是未来我国城市治理和发展的主导性策略。”唐皇凤认为，第一，要坚持服务为先的治理理念。把满足市民的需求作为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及时发现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城市基层社会中的各种治理难题，做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不断提升市民对公共服务的体验。第二，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协同化。在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厘定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体制机制。第三，坚持治理手段数字化和智能化。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资源，建立精准识别、动态追踪、集成共享的信息资源数据库，实现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第四，实现治理标准规范化。按照人岗匹配、职责明确、考核合理的基本要求设计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积极推进治理绩效考核指标的多重化和科学化。同时，从重视经验和定性分析转变为重视科学和定量分析，实现城市治理体制的主动化、常态化和法治化，不断增加城市治理体系的开放度和包容性。

在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韩福国看来，现代城市是现代国家的主要载体。要形成机制完善、功能明确又相互配合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需要城市政府具备政治智慧，通过制度载体供给和政策行动激励，确保规划参与、民主管理、基层自治、信息共享之间相互匹配。现代城市的治理结构应该有以下几个层面：从城市的物质形态即

生态和规划的角度创造城市元治理；从法律和公权角度创造城市的硬治理；从社会和公民维度形成软治理，实现城市基层民主、公共事务多元共治等；从技术和信息角度创造巧治理，有效利用现代技术优化资源集聚和空间配置。

“智慧治理深度融合了治理中的技术和理念、制度、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城市治理决策、执行及评估等有机结合，创新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构建弹性、权变、可持续的城市治理模式。”夏志强说，随着人类迈入数据时代，物联网、地理信息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社会计算等关键技术的数据收集、传输和处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据时代使得智能治理成为必然，先进技术为智慧治理提供了可能。

履行汞公约中国将交出怎样的答卷

王晨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20年6月11日

具有高生物毒性的汞被广泛用于重要的工业领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汞生产、消费以及排放国，汞消费量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一半，汞及其化合物涉及中国一些重大民生行业，但目前汞在中国化学品管控序列中并不靠前。生态环境部联合各部门在2017年发布的《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生效公告》对各涉汞行业制定了履约计划，2020年是其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中国还加入了涉及汞的《巴塞尔公约》和《鹿特丹公约》。然而要如期达到履约目标，中国依旧需要在诸多方面加快行动紧张面对。

土壤汞污染沉痾难除

中国早在2013年就已作为首批签约国，在日本熊本签署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简称《水俣公约》）。拥有3,000余年采矿史的万山汞矿，在破产前曾是中国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储量及产量一度达到亚洲之冠、世界第三，在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间贡献汞资源约2万吨。去年9月，由中国多个民间环保组织组成的汞污染防治调研组（以下简称汞小组）实地调研万山汞矿，原来生产力最先进的厂房进去感觉空气非常差，有一股刺鼻的气味，因为其成分特别复杂，取样后还没有确定如何检测。谈及调研过程，发起人田静说，她也是汞小组一员，对当时的嗅觉刺激记忆犹新。让汞小组担忧的是，该汞矿的尾矿库区内依旧存在碱性渗漏水被用于生活、冶炼废渣裸露道旁、厂房堆放不明固废等现象。万山污染场地治理进度缓慢，然而经年历久的汞污染问题对于当地民众似乎已成令人麻木的旧闻，汞矿区域有放牧与粮食种植现象，处于开放状态的一个库区内甚至有家长带着孩子采摘食用野生刺梨。

汞小组在2019年底发布的《中国汞污染防治民间观察报告》认为，因资源枯竭而关

闭18年的万山汞矿依旧存在环境欠账，污染治理有待完善。此类汞污染场地治理问题在2019年末《水俣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被列为重点议题。根据生态环境部此前发布的履约计划，中国要在2020年建立持续更新的含汞污染场地动态清单，制定促进汞污染场地修复治理的经济政策。2032年要关停所有原生汞矿的开采。在之后的十几年内，中国会有越来越多被关闭的汞矿需要系统治理。

一位汞污染防治专家认为，目前针对此类汞矿库区，对废渣等遗留问题采取的是封存、隔断和绿化等措施，防止污染物迁移造成对河流下游的进一步污染。据田静从汞矿所在的铜仁市万山区了解到的情况，资金紧张依旧是汞矿治理进度缓慢的主要原因，对农田的治理思路仍是调整种植方式，由水田改为旱田，对超标农田与河流的治理目前还仅限于一些试点。

淘汰添汞产品

相较于污染场地治理，中国在公约要求不晚于2020年禁止生产和进出口的7大添汞产品方面取得了更快进展，目前，含汞开关和继电器、含汞农药、生物杀虫剂和局部抗菌剂已被淘汰。在中国享有5年豁免期的美白化妆品的情况似乎也比较符合公约要求，无毒先锋曾在去年9月、10月先后两次在京东、淘宝和拼多多三大电商平台抽样采购美白化妆品，经检测其汞含量均未超标，电池、荧光灯、体温计、血压计和牙科汞合金仍在生产和使用。但汞污染防治专家也表示，这几类产品的用汞量已经逐年降低，像一些荧光灯管现在已经不含汞了。

无毒先锋学术主任毛达认为，目前淘汰添汞产品的主要履约障碍在于含汞的医疗器械方面。但实际上2006年后，中国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联手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就曾先后在北京天坛医院和积水潭医院联合开展无汞医疗试点项目，该项目主要为了完成含汞医疗器械替换，这其中积水潭医院几乎完全替换了所有含汞温度计与血压计。秦皇岛妇幼保健院在2011年也参与了民间环保机构发起的清汞行动，进行含汞医疗器械替换和相关医护人员培训。

但毛达也透露，目前中国的医疗机构在减汞方面进展不明显，无汞医疗是一项系统工程，成本颇高，除器械替换、保存、处理外，替代品的精确度提升、新器械的操作流程培训也影响着医疗机构的减汞进程。中国已经以替代昂贵、替代品准确度不足等为由对含汞体温计、血压计生产申请了5年的豁免，其淘汰时限将延长至2025年。

目前唯一尚未明确淘汰期限的是耐用的牙科汞合金，《中国汞污染防治民间观察报告》对牙科汞合金材料使用情况的调研结果显示，来自7省市的18家医院口腔科或口腔诊所中，仅有5家使用汞合金材料。汞小组调研的访谈内容显示，因为牙科汞合金本身

已经没有价格优势，医护人员操作过程有吸入风险，并且树脂等新材料更加美观，多数口腔医生会选择使用新材料。但仍旧有少数患者会因为不够了解材料之间差异或为了省去材料脱落反复补牙的风险选择牙科汞合金。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郑树国教授曾在去年无毒先锋等机构举办的牙科银汞合金材料在我国的使用情况研讨会上表示，随着大众及口腔专业人员意识的提高、口腔临床材料的发展，淘汰这一材料应该没有问题。《中国汞污染防治民间观察报告》则建议将这一淘汰时间设定在2025年。

棘手的PVC

针对添汞产品，汞污染防治专家提到中国现在超低汞触媒研究方面已有不错的进展。汞触媒的应用与电石法聚氯乙烯（PVC）生产有关，这是中国耗汞最大的产业，占中国汞消耗量的50%。据统计，截至2018年末，全国聚氯乙烯的总产能达2,404万吨，PVC作为一种塑料，广泛应用于软管、绝缘体和充气产品中。

通过电石法聚氯乙烯合成反应生产PVC时，氯化汞触媒是必不可少的催化剂。虽不参与化学反应，但因易升华易失活，汞触媒回收治理难，从氯化汞生产到电石法生产PVC，再到废汞触媒的回收，都涉及一定的汞污染问题。尽管中国的低汞触媒研发不少，但如何在降低含汞量的同时保持良好的催化性能仍是行业难题，目前行业对于汞触媒的依赖度依旧较高。

根据生态环境部给出的履约时间表，2020年聚氯乙烯单体单位产品汞使用量要比2010年减少50%，到2025年全面淘汰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氯碱生产，这使得PVC行业的压力日渐趋紧。有行业分析认为，占PVC产能主要份额的电石法装置将会面临政府环保行动带来的退出压力，2019年末PVC的价格上涨就与之有关。

相关部门也开始针对推广含汞量更低的触媒提出了新计划。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MEE-FECO）于1月20日就电石法聚氯乙烯低汞触媒应用与无汞技术万吨级示范技术支持项目发布了招标公告，该项目被要求于2022年底前完成。另外，最近电石价格的上涨遭遇乙烯价格下跌，乙烯法PVC生产是一种无需消耗汞的PVC生产方式，但此前囿于原料和能耗成本，一直无法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比，有行业分析认为未来更环保的乙烯法PVC将获得更大份额，改变电石法PVC占领八成市场的局面。

汞排放的监控难题

《水俣公约》涉及的10大行业中，半数都与汞排放或释放相关，这其中有色金属冶炼、燃煤电厂、水泥生产、废物焚烧等都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人为汞排放源。据专家介绍，这些行业都有相应的汞排放标准。环保政策收紧引发的行业改革，对包括汞在内的重金属排放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以汞大气排放量最大的燃煤电厂为例，中国从

2014年开始对燃煤电厂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并实行史上最严的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促进了汞的减排，有研究认为这些举措成效可观。

而由于垃圾量的不断增加，垃圾焚烧的汞排放量正呈增长态势。2019年4月中科院发表的一项研究《我国生活垃圾焚烧过程的汞排放特征》显示，中国垃圾焚烧厂排放的烟气汞分布比例普遍高于联合国环境署给出的参考值。汞污染防治专家说，垃圾焚烧导致的汞排放主要是因为含汞产品混入其他垃圾被焚烧而导致的。但推行垃圾分类并不能成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毛达认为，目前垃圾分类工作中，有害垃圾的回收和处置被边缘化的情况会导致含汞产品进入焚烧厂，即便这个问题会得到改善，源头无汞化才是更根本的解决方式。他还提到，数据代表性不足也是汞排放控制工作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汞及其化合物挥发性很强，因此排放数据监测相对其他污染物更难。汞污染防治专家也表示，汞污染监测、源头减汞以及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处理的相关技术还仍处于发展阶段。

环境视野

中国“新冠外交”的危与机

雷田 澳门 新华澳报网 2020年6月15日

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冠外交”注定将是标志性的历史时段。几乎没有哪个单一事件，能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全方位地“测出”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整体外部环境。通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广度和深度。这些变化此前大多已初露端倪甚至非常明显，但新冠肺炎疫情使其更加凸显。中国“新冠外交”的成效，取决于能否快速、灵活地应对环境之变，继续为国家崛起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尤为重要的是对欧美的外交。中国的对外开放，起步时主要是向西方国家开放，未来的开放也不得不直面西方。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已经步入了调整期，这也是中国外部战略环境变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新冠肺炎疫情让这种调整呈现加速度的态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冲突点与契合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晰度。疫情结束后，中国与欧美国家外交关系的调整，方向会更清晰，力度也会更大。这对中国外交是一个巨大考验。

新冠冲击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典型的“黑天鹅”事件，造成的冲击始料

未及。作为首个遭受疫情冲击的国家，中国的战疫过程，不得不说带有某种悲壮感。突如其来且原因不明的病毒，使中国的战疫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应对模板。另一方面，“危机下自保”的心态，客观上给中国战疫造成了“孤独感”——那时中国是唯一的疫情重灾区。试想一下，1978年中国向世界打开国门以来，何曾遇到过疫情期间那种规模的停飞断航与人员隔离？

对比中国融入世界的心态和历程，就不难想象那种“隔离”造成的心理冲击。那时，中国的铁腕封城被西方舆论指责为反应过度，西方国家的“隔离”被中国视为反应过度。回过头来看，哪种“反应过度”更站得住脚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是非判断上升到了外交层面，进而演变成中国外交的压力。中国还在苦战疫情，欧美国家还风平浪静时，围绕疫情的争议就是中国战疫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欧美之后，中国曾经采用的居家隔离、封城等措施，在西方舆论中成了不带贬义的中性词，但对中国战疫的评价却没有变得更“中性”。中国从疫情震中到援助他国抗疫的角色转变，也没有为西方舆论注入相对客观、理性的动机。不仅如此，欧美疫情恶化衍生出的政治“甩锅”，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国把矛头指向中国。外交层面的交锋，升级为对中国的调查、追责甚至经济索赔。

特朗普政府是领头者。但值得深思的是，在外交上向来“美国独行”的特朗普政府，为何在西方国家中能有呼应者甚至追随者？这绝不是因为特朗普的个人魅力，也不是因为美国的领导威信。这无可争议地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映射出的，不只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中国直面的是整个西方世界，这也是中国「新冠外交」的突出特点。上一次出现较为类似的局面，还是冷战末期欧美因意识形态问题而封锁中国。但这一次，问题要复杂、深刻得多。

中国“新冠外交”的压力，首先表现在话语权上。中国认为西方的指责是在通过转移焦点推卸责任，西方觉得中国强势的外交表态、频繁的援助国际抗疫，是想以改变“新冠叙事”来逃避追责。不得不承认，西方媒体、学界、政界构建的中国认知的稳定性，客观上转变成了西方针对中国的话语权优势。即便这种认知已经与现实背离，“叙事的权力”还在发挥作用。话语权弱势，是中国外交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叙事之争”体现的不只是话语权问题，甚至不能简单地视为西方的政治操弄，背后是更为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认为中国战疫表现优秀的看法是幼稚的，在中国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这个表态，某种程度上说反映的是西方政治人物的集体心态。在这种心态下，战疫成功的“韩国模式”不足为虑，中国战疫成功的论断就是问题。通过批评中国“胜之不武”，来反衬西方体制光环依然闪耀。

新冠危机凸显了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意识形态涉及立国之本，一旦尖锐对立就有滑向新冷战的可能。历史地看，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下实现的。那也是一段世界秩序相对“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中国是最大的获益者之一。新冠危机引发的西方意识形态焦虑，无疑会反映到未来世界秩序的塑造上。对世界依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欧美国家，在秩序塑造上肯定会加入更多防范中国的因素。对于中国来说，新冠冲击是双重的，既冲击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冲击中国所处的世界体系。

重塑契机

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西方媒体、政客对中国搞“有罪推定”，中国遭遇疫情时臆测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倒台，援助他国抗疫时猜测中国搞“慷慨政治”，借机扩大国际影响力。新冠危机引发的意识形态焦虑，本质上是西方内部的问题，但同时也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国内行为越来越具有国际效应。正如中国前副外长傅莹所说，现在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不仅关注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也关注不断发展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

新冠危机可以说是这种“关注”较为极端的体现。比如，对于某些西方国家的“甩锅”，中国的外交回应，在西方媒体中的定性是“正面应战”，甚至被描述为“战狼外交”。美国前外交官杰夫·穆恩对此的看法是，发生变化的不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质与基调，而是因为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加，我们现在变得更加严肃地看待中国的官方宣传了。“新冠危机是最新，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例证，即中国的政策声明在如何影响国际事务。”

所以，在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关系有恶化可能性的同时，更应注意到关系重塑的一面。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事实，差异演化为矛盾也不全然取决于中国的主观意愿。但是，意识形态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它必然体现为具体的政府政策、外交行为。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中国重演冷战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交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在不凸显差异的前提下，把着力点放在如何应对中国与欧美关系的重塑上。

对于中欧关系的重塑，中国或许不得不面对选择性脱钩的事实。3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外来投资审查指南”，尤其提到了要加强对医疗行业、公共卫生领域外来投资的审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这份指南表示，我们需要保护欧洲的安全与经济主权，“欧盟现在和未来都会继续向外来投资开放市场，但这种开放不是无条件的”。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称，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控制开放的节奏，对于外来投资要问个为什么。这些表态虽然没有提及中国，但针对性不言而喻。

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动，传统盟友美国倾向于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的背景下，欧盟无疑会加大对战略自主的投入。菲尔·霍根表示，我们需要讨论战略自主意味着什么，其中就包括建立更加具有韧性和多元化的供应链。不难想象，这样的供应链会考虑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绕过”中国。对于欧盟来说，这不仅涉及经济利益，还是一个战略问题。欧盟战略自主的参照，是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一个与中国全面脱钩的欧洲，不可能在战略上更加自主。

冷战结束以来，共同的危机往往是中美合作的动力，如今的新冠危机却成了双方对撞的加速器。大的背景是战略竞争，但目前中美关系剧烈震荡，主要是因为美国进入了选举季。特朗普政府“甩锅”的影响不容小视。一旦特朗普成功连任，他会继续沿着战略竞争的路径走，即使拜登胜选，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会偏离“特朗普路线”太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重塑的难度要比中欧关系更大。

中美关系有继续恶化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通过重塑趋于相对稳定的空间。中美已经谈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本质上就在遵循“互利”的互动逻辑，长远来看也是一种秩序重塑。如果美国铁了心与中国对抗到底，就根本没有谈的必要。美国的“再次伟大”必须以经济实力做依托，全世界90%以上的消费人口在美国之外，美国不可能绕开即将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与媒体聚焦的外交交锋相比，中美第二阶段经贸谈判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更值得关注。

内外兼修

截至4月29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10万，在确诊病例总数世界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六个是西方国家，确诊病例总数占比近60%，其中美国就占了三分之一。而中国的确诊病例总数世界占比仅为2.7%。战疫结果的巨大差异，很可能导致西方在疫情结束后掀起“问责浪潮”，而中国将是主要目标。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略定力尤为重要，“新冠外交”理应着眼长远。

历史地看，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与国家实力的崛起相比具有滞后性。一战前美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英国，但美国话语权优势在二战后才展现出来。傅莹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论述，“总体上看，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还没有完全打破，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仍有待提高”。但她也指出，“改变他人的偏见不能只靠批驳和辩解。我们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更有说服力地阐释中国的意图和目标，把叙事重点更多放到展现中国与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行动上去。”

新冠危机凸显了中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这是中国

崛起过程中难以逾越的政治屏障。但傅莹认为，一个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扩大开放的中国，一个矢志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不愁没有好的国际口碑。在国际政治学上，这种内外兼修体现的是“道义政治”。伦敦政经学院学者金刻羽撰文称，通过行动而非言语，中国领导人可以基于道义责任而不是地缘政治利益来重建中国的国际形象。

关于道义与政治，美国思想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总结二战的教训后写道：“只有当我们意志坚定以及我们的道义目标与战略考虑相匹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得人类免于另一次灾难。”疫情结束后，无论欧美如何操弄政治，整个国际社会都势必思考如何“免于另一次灾难”。中国外交中道义与战略的结合，正当其时。

疫情形势下美国会为转嫁危机对中国出手吗？

张旭东 香港《紫荆》2020年6月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和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全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美国被迫集中精力抗疫的同时，大肆甩锅中国，“中国瞒报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甚嚣尘上，在极力撇清特朗普当局防疫责任的同时，也为对华出手打压埋下伏笔。本文着重探讨美对华转嫁危机的战略冲动和可能举措，并就中国如何应对提出一己之见。

一、特朗普对中国转嫁危机的战略冲动不断累积

第一，新冠疫情对中美博弈态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疫情暴发前，美国即已将中国确定为全面战略竞争对手，全政府对华强硬成为民主、共和两党少有的共识，并从经贸、科技、军事、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加大对中国打压力度，核心目的是打断中国崛起势头，防止中国迅速成长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在新冠疫情暴发和应对过程中，中国迅速控制疫情，随后慷慨地向世界150多个国家和组织伸出援手，进一步突显了中国制度优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扩大了中国国际影响力。而美国政府疫情应对迟缓，内斗虚耗不断，迅速成为全球疫情“震中”，且频频曝出普通民众得不到及时检测、从盟友手中抢夺抗疫物资等丑闻。同时，面对中国实力及影响的提升，美国对华“焦虑感”增大，防范、打压中国崛起的紧迫感进一步上升。

第二，新冠疫情对特朗普连任前景产生直接冲击。目前，美国总统选举对垒形势已基本明朗，特朗普将接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挑战。疫情前，特朗普凭借亮眼的经济“成绩单”，支援率居高不下，拥有较大胜算。但疫情不仅毁掉了经济，增加了失业率，更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面积感染，导致美国出现自“南北战争”和1918年大流感之后最多的

一次人员死亡，成为特朗普竞选道路上的“阿喀琉斯之踵”，也成为民主党打击特朗普选情的关键手段。据4月中旬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对疫情危机的速度太慢。同期盖洛普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3%，反对率为54%，支持率比3月份的49%大幅下降，而反对率从45%上升了9个百分点。美媒称，这是现代民调历史上“聚旗效应”（指美国每逢重大危机，民众倾向于聚集在现任总统指挥下共同应对危机，总统民众支持率会迅速上升）消退速度最快的总统之一。

第三，特朗普向中国转嫁危机的征候日益显现。一是特朗普对中国抗疫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疫情在中国集中暴发时，美国持超然事外的态度，特朗普在多个正式场合对中国抗疫的力度和透明度给予明确肯定。但随着中国疫情迅速得到控制，美国疫情迅速扩大，特朗普态度也发生重大转变，开始频频公开、固执地批评中国“隐瞒”疫情，对西方疫情扩散负有责任。特朗普的表现印证了日前媒体曝光的共和党战略师起草的竞选备忘录，其中要求面对任何追责问题，都要毫不犹豫地甩锅中国，并拟定了具体应答要领。二是美国鼓噪追责索赔已从民间行为上升到政府行为。特朗普和蓬佩奥等多次鼓噪“中国责任论”“中国隐瞒论”“中国疫情数字造假论”，甚至公开散布新冠病毒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言论，并展开所谓调查。美国会也提出多项法案，启动对中国的调查和索赔。三是美国宣布断供世卫组织并追查其责任的真实意图也是为了打击中国。世卫组织介入中国抗疫全程，从总干事谭德塞到参与的专家，无不对中国抗疫行动和成效感到“不可思议”和“震撼”，在对外评价表态中不吝赞美之辞。可以说，世卫组织已成为中国抗疫成效的公证人。通过断供甚至准备另起炉灶等极端行动，同时散布世卫组织“以中国为中心”“被中国收买”等不实言论，美国意在打击世卫组织的公信力，进而在未来追责中国时砍去对中国抗疫成效最有力的国际支持。

二、美国将多域出手转嫁危机

第一，定性抹黑、追责索赔。目的是通过展开实际追责行动，大造追责索赔的声势，迎合美国民众的创伤心理和国内鹰派的反华冲动，提升支持率。美国将动用其国际话语优势，官民、盟友齐上阵，发起“反华疫情公关闪电战”，适时公布所谓“调查结果”，炮制新证据，将疫情责任栽赃中国。罗织“调查结果”和证据后，美国将据此启动诉讼、制裁等追责索赔行动。4月21日，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在被问及美国如何对中方进行追责时称，美国有很多工具可用，包括在美国对中国提起诉讼，因为中国在全球各地都拥有大量资产。可见，届时中国购买的美债、部分在美资产都可能成为目标。

第二，产业脱钩、金融打击。目的是加速产业和资金撤离中国，打击动摇中国的经济基础。产业脱钩从疫情前即已开始，疫情过后，美将重启对华贸易战，维持甚至增加

对华高额关税,推动国际企业从中国向其他国家转移;在芯片、5G、AI等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企业进行全面围堵封杀,斩断关键零部件供应链,打击中国高端制造业;运用美国内法对央企进行长臂管辖,制造另一起“中兴事件”,谋取巨额罚金,打击中国行业领先企业;利用国际原油市场、期货市场的大幅震荡,制造更大规模的中行“原油宝”爆仓等事件,打击中国金融市场信心,进而造成中国社会动荡;以防疫失当为由,对中国政府官员、医药企业、航空公司等进行制裁,拒发中国官员赴美参加联合国会议的签证等。

第三,围堵压迫、军事威慑。目的是在中国周边全面收紧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压力,打击中国的国际影响。疫情过后,美国将在抹黑追责基础上,全力介入中国周边,强化对中国的孤困打压。在南海大打“法理牌”,鼓动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起诉中国,挑战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加紧在南海开发油气、建设岛礁等,同时抹黑中国不得不采取的反制行动;在台海大打“台湾牌”,落实“台北法案”积极协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升级美台交往层级、派军舰泊台等,增派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在台海附近举行大规模演习,对中国实施恐吓;极端情况下,在中国海空军近距对峙过程中,视情挑起有限军事摩擦冲突;在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关键地区制造动荡导致中资遭受严重损失,或加大对委内瑞拉、伊朗、朝鲜政权施压甚至颠覆,扰乱中国国际战略依托,打乱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三、发动对华“热战”很难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选项

第一,利益不允许。即使最反华的美国政客也必须承认,美国在气候变化、医疗防疫、产业分工、国际安全等攸关全球的问题上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美国若真“失心疯”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将摧毁世界和平发展的根基,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必然遭受挫败并加速美国的衰落。特别是疫情过后,世界和美国最优先的课题是恢复经济,而中国是重要的引擎,美国对中国开战,其为转嫁危机而置世界发展利益于不顾的企图昭然若揭,将导致其道义尽失,不仅无法转嫁危机,还将酿成更深刻的领导力危机。

第二,能力不允许。美国对中国开战的方向无非是南海和台海。南海方向,美国在同盟体系和战场建设上先天不足,日、澳、英、法等域外盟友不会积极追随美国进入南海作战,域内唯一盟友菲律宾已宣布中止《菲美部队访问协议》,不会甘心为美提供前沿基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更不愿在中美间选边站队成为炮灰。而中国本土俯瞰南海,仅在南沙、西沙即拥有4个一流机场,作战体系完备,兵精将广,粮草充足,且以逸待劳、聚实击虚,美国在南海没有胜算;台海方向,美虽经营多年,但仍需由本土抽调大量兵力劳师远征,持续部署耗费甚巨,作战进程却不在自己掌控之下。如果大

陆忽然锁台，以精确制导火力毁掉台湾的商港和电力，追瞄“台独”分子，以台湾偏居东南海上一隅的地理处境，必将短期内经济尽毁，人心尽失，而大陆背后是广阔的欧亚大陆，筋骨不伤，届时很可能大陆不用派出一兵一卒，即可收复台湾，而美军几无用武之地，被拖成疲惫之师。

第三，疫情不允许。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过百万，且远未见底。美国军队也成为疫情感染重灾区，位于西太平洋前沿部署的2艘航母均出现疫情，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前沿战备水准和应急反应能力下降。如果今日台海或南海发生战事，美国可动用的一线作战兵力和后勤保障力量可谓捉襟见肘。美国要控制住疫情，到美国总统选举的11月前几乎不可能完成，而且还要随时面临疫情二次暴发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想组织大规模军事作战行动几无可能，遑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战！

第四，未见决心和征候。近期中美海军一度在南海短兵相接，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4月份在南海和台湾东部训练期间，美国也临时组成“美国”号两栖攻击舰编队进入南海和台海周边巡航，但始终未与中国航母编队正面对抗，而是远离中国航母编队进入南海南部游弋。同期，位于关岛部署的全部B-52战略轰炸机也以“动态力量部署”为由返回美本土，结束位于关岛数十年的前沿轮换驻守。从中窥见，美国有军事制衡中国之意，却无不惜与中国一战的决心。

四、中国的对策

第一，把握大势，及早筹划后疫情时代战略。疫情过后尽管会有不少噪音和干扰，但几个大势需要把握：一是恢复经济是全球当务之急；二是同舟共济才是有效应对疫情的唯一出路；三是全球化不会发生根本逆转；四是多边主义将加速发展。据此，中国应及早筹划后疫情时代战略，以应对大规模疫情流行为契机，加速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联合国出台相关决议或愿景，确立全球合作恢复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第二，加强合作，深化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深化中国与世界的产业合作，拓深中国大陆消费市场，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动能；维护中日韩在抗疫中形成的来之不易的合作氛围，加快推进东北亚共同体建设；稳妥处置周边海上权益争端，适当减免第三世界的困难国家债务，扩大反对霸权统一战线；深化与欧洲的互利合作，适当照顾对方关切，向欧洲开放更多的市场；坚决支援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加速推进多边主义；坚持以疫情应对为抓手，塑造中美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激发美国内理性力量，纠正当前偏执好斗的短视倾向。

第三，保持警惕，加紧应对复杂局面的军事作战准备。大战打不起来、小战风险上升，是对疫情过后中国面临军事安全风险的基本判断。中国应提高警惕，将中美间危机

管控由战略管控向战术管控延伸，防止形势误判和斗争升级，加快军事力量整体发展建设，同时精心准备美国可能挑起的边缘军事摩擦冲突，以及冲突发生后迅速稳定现场形势、稳定国内民心 and 外资的方法策略。

学术前沿

专家解读《民法典》

《民法典》的时代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谢鸿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入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编纂民法典的条件已具备：一是强烈的国家意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编纂民法典的内容，无疑是本次民法典编纂成功最为重要的助力。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法典诞生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没有市场经济，它的作用空间将大为压缩。三是高超的立法技术和深厚的学理积累。民法典共七编1260条，涉及不同领域，要将这些规则整合为一个有机的体系，需要醇熟的立法技术和深厚的民法学理论储备。（《中国发展观察》2020年11期）

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第一，推进民事立法的体系化。就内部体系而言，民法典形成由总则、物权、合同等各编构成的完整体系，各分编构成自成体系又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就外部体系而言，民法典的颁布有效衔接了民法典和单行法。此前，由于没有民法典，许多重要民事关系的调整规则不能通过民事法律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留下了法律调整的空白。这些法律空白一般通过行政法规等填补，难免出现限制公民私权或变相扩张行政权的现象。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现代法治的核心在于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一方面，民法典为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明确边界，有利于规范公权。另一方面，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百科全书，民法典通过合理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各种民事纠纷的预防 and 解决提供基本的遵循。

第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民法典各项制度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土壤，

也反作用于市场经济。民法典完善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第四，有利于实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资讯集中”。可以说，执法者、法官只要有一部民法典在手，通过领略其规则和精神，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此外，民法典还有利于统一规则依据。（《解放军报》2020年6月18日）

《民法典》的立法创新和亮点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梅夏英**：第一，民法典最大的亮点是人格权独立成编。这是我国立法体系上的首创，也是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所未有的。这充分体现出民法典注重人文关怀、彰显人文精神的价值理念和价值体系。新时代我国对于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保护序列的变化，以及曾经的民法通则时代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技术性预留等等，都表明人格权在我国现行民法典中有独立成编的必要。人格权编解决了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有效确定了生活中究竟存在哪些明显需要保护的人格利益类型，并将其公之于众；二是整理和设计了人格权保护的相关制度和办法，便于法律适用，如人格权保护的禁令制度、人体器官捐献和买卖问题、人体基因和胚胎的科研规则以及隐私权的定义和扩大保护。

第二，在体例上，民法典没有采用债法总则，而是单独设立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以合同编来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对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制度和债法总则部分内容，分别纳入合同法的“准合同”部分和“合同履行”。民法典的这种立法协调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予以实现：一是在合同编第一分编通则中规定了无名合同的法律参照适用。这为大量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法律适用上的依据，进而可以化解债法总则编缺失所产生的无名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二是对于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规定直接适用有关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定或参照适用合同编通则之有关规定，等等。这种创新的意义重大，一是它解决了债权对于合同法的切割和限制问题，让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自成一体；二是它解决了民法上债和责任的区分问题，无论是权利请求权还是侵权责任，在总则上都体现为民事责任，侵权责任不再成为债的类型。

第三，民法典物权编扩大了物权平等保护的范围，进一步将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范围拓展到所有的财产权，包括股权、知识产权等。这是我国法律史上第一次将私人财产权和国家享有的财产权相提并论，并赋予两者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保护原则完全契合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的精神。

第四，民法典在合同编重置和更新了合同效力制度体系。民法典在合同效力问题上对原有法律改动较大：一是确立了预约合同的相应效力（比如约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二是不再将无权处分合同作为效力待定合同处理。三是确定了因未获批准的合同为未生效合同。（《中国发展观察》2020年11期）

从四个“维度”把握民法典 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永胜**：从高度看，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彰显。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色、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它的颁布实施，对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良法善治，必将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

从深度看，民法典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民法典的颁布实施进一步提升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化水平。”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以法典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并将其转化为法律上和现实生活中具有操作性、执行力和强制力的具体制度，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支撑，确保市场经济以法治为基础，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受法治规则调整。

从温度看，民法典回应人民法治需求，饱含爱民、护民、利民、惠民的人民情怀，蕴涵着浓厚的人文关怀。民法典以人民为中心，对接人民的法治需求，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实实在在写进法律条文中，镌刻在法典中，更好地为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民法典健全和充实了民事权利种类，形成了更加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完善和细化了权力保护和救济规则，形成规范有序的权利保障机制，以法治方式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根基。民法典始终围绕人民权益的确认和保护展开，秉持全生命周期保护的系统理念，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从抽象到具体的全生命周期权益保障，为公民民事权利提供了全方位保护。

从广度看，民法典对治国理政有重大意义。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与有力支撑。编纂民法典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李永胜谈到，民法典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它是保障个人权益的重要法律之一，事关

每一个体的方方面面，它以对人的保护为核心，以权利为本位，系统全面地规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在民事活动中享有的各种人身、财产权益，为民事主体的社会生活提供了行为实施的最基本秩序。民法与国家其他领域法律规范一起，支撑着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保证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常有效运行的基础性法律规范。（人民网 2020年6月22日）

信息快递

广西深化矿产资源改革 《香港商报》6月5日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日前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黎修旦6月2日表示，这是广西矿产资源管理地方法规实施以来最大、最全面的矿产资源管理改革。针对多年来矿产资源管理存在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广西紧紧围绕“放管服”和优化营商环境目标，进一步下放审批权力。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处长周文称，改革后，矿业权出让登记权限将按矿种实行国家、自治区、设区市三级管理，设区市可委托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让登记普通建筑用砂石矿产采矿权。改变过去按储量规模、矿种、投入等多种标准划分审批权限的做法，实行同一矿种矿业权出让登记同级管理。

中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英国 路透中文网6月8日报道，中国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明确要求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在当前复杂形势下高度重视防范债务风险工作，强化违法违规举债责任追究：不能因为应对疫情就不重视债务风险，不能因为财政困难就违规举债制造新的风险，绝不为解决短期问题而留下后遗症，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决防止项目一批了之、资金一拨了之，杜绝萝卜快了不洗泥现象。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切实加强财政资金管理，一笔一笔审批，全程跟踪监控。地方各级政府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除疫情防控、应急救灾事项外，预算执行中一般不再追加预算，坚决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盘活存量资金资源资产。

中央万亿新增资金直达市县 香港《信报》6月10日报道，保就业、保民生和保市场主体要靠市县落实，今年国家确定新增减税降费2.5万亿元，其中减免社保费将可为市场主体减负1.6万亿元，大部分在下半年实现。很多地方也在自主减税降费，虽然这将有力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缓解困难群众之急，但也给市县财力带来很大

缺口。因此，把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共 2 万亿元资金直达市县，就是要支持地方落实帮扶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群众措施，加强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与用于抗疫相关支出等。而财政部也要同步建立全覆盖、全链条监控系统，至于各级国库则需要督促做到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确保账实相符。

海南试点开放第七航权《香港商报》6 月 10 日报道，《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开放第七航权实施方案》指出，中国民用航空局在现有航权安排之外，鼓励并支持指定的外国空运企业在海南省具有国际航空运输口岸的地点经营第三、四、五航权以及试点经营第七航权的定期国际客运或货运航班，第七航权航班每条航线客货总班次最高每周分别为 7 班，海南省已开放的第三、四、五航权航班无班次限制。指定外国空运企业经营第七航权航班时，在海南与中国境内的其他地点之间无串飞或中途分程权，第七航权的试点开放政策按照国家外交、航空安全、应急管理以及运输发展等宏观调控政策实施。

中国拥 55 项世界遗产全球居首《香港商报》6 月 14 日报道，自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已成功申报世界遗产 55 项，其中，文化遗产 37 项、自然遗产 14 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4 项。世界遗产总数、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是近年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目前中国有武陵源、九寨沟、黄龙、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中国南方喀斯特、三清山、中国丹霞、澄江化石地、新疆天山、湖北神农架、青海可可西里、梵净山、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14 项世界自然遗产，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和武夷山 4 项双遗产，总面积达 6.8 万平方公里。

讯息速递

文化创新擦亮老品牌 台湾 新浪网 5 月 10 日报道，2019 年 12 月 22 日，青岛啤酒节跨越 1.3 万公里的距离，走进了赖比瑞亚首都蒙罗维亚。“青岛啤酒节将促进赖比瑞亚文化和旅游发展。”在啤酒节新闻发布会上，赖比瑞亚新闻、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兰斯·巴约贡说。在 2019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中，山东共有 41 个品牌入选，位居全国第三。作为经济大省和全国制造业高地，山东一直把质量强省和名牌战略，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举措来抓，涌现出一批以海尔、潍柴、浪潮、青岛啤酒等为代表的品牌企业。文化是品牌的灵魂，也是老字号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952

年建厂的东阿阿胶通过将文化营销上升到战略高度，积极传播中医药和阿胶文化，擦亮了老字号招牌。在能源化工领域，成立仅仅 15 年的中融新大集团，连续两届稳居中国民营企业百强榜。2019 年，“烟台葡萄酒”第四次荣登中国区域品牌价值评价前十名榜单，品牌价值达到 876.66 亿元。

4 月全美零售数字下跌 16.4% 香港中文网 5 月 15 日报道，根据商务部周五发布的数据，4 月份整体零售额创纪录地下降了 16.4%，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12% 的跌幅。3 月份零售额修正为从之前报告的 8.7% 下降 8.4%。核心零售额，不包括汽车和天然气成分，下跌了 16.2%，较前一个月下降了 2.8%。经济学家此前预计该月核心零售额将下降 7.6%。分析称，由于冠状病毒导致的业务停顿使购物者望而却步，威胁着全国各地的商店并拖累了经济下滑，而在过去过去 12 个月，全美的零售额下降了 21.6%。分类来看，服饰销售额受挫最严重，下滑 78.8%，电子产品和其他设备下滑 60.6%，家具家装下滑 58.7%，运动用品下滑 38%，酒吧餐厅销售额下滑 29.5%。而非在店销售零售额则上涨了 8.4%。

中国启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 台湾新浪网 5 月 14 日报道，为加快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和转型发展，今天(5 月 1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17 个部门以及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 145 家单位，共同启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伙伴行动将围绕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问题，通过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机构支撑—多元服务”的联动机制，推出普惠性的“上云用数赋智”数字化转型服务。伙伴行动还将打造基于网路空间的“虚拟产业园”和“虚拟产业集群”，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推进市场订单、研发设计、生产能力、营销渠道的数字化共享，汇聚转型合力，提高转型效益。同时，针对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压力大的共性难题，伙伴行动将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支持。据介绍，伙伴行动首批已经推出 500 余项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服务举措，中小微企业可通过登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网站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支持。

湖南启动“医+X”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香港 新浪网 5 月 14 日报道，湖南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在南华大学启动“医+X”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致力于培养“学科交叉、服务临床、注重创新、引领发展”的复合型医学人才。据南华大学校长张灼华介绍，南华大学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教学资源，积极探索“医+工”和“医+理”的“4+2”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即 2 年理科、工科专业学习与 4 年医学专业学习相结合，并鼓励医学生辅

修双学位，同时鼓励工科和理科专业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学生攻读医学专业。张灼华说，南华大学推进医学类课程改革，坚持医教融合，减轻学生负担，强化医学生的实践教学和能力的培养。推进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整合，完善全科医学班课程设置，让医学生更适应服务社区需求。

湖北出台优化营商环境“30条” 香港 文汇报 5月15日报道，湖北省日前印发《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全面对标国际国内一流营商环境，出台30条重点攻坚任务和硬措施，努力把湖北打造成为发展环境最优，投资吸引力、地区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措施分为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三个部分共30条，紧扣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反映的突出问题，围绕政务、市场、法治三大关键领域，靶向发力，实施一批改革举措。政务环境方面，推行“一网通办”，推广“一事联办”；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能，武汉、襄阳、宜昌市区一般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从目前的100个工作日，压缩至60个工作日以内等。市场环境方面，实行企业开办“210”标准，即开办2个环节、1天内办结、零费用（免费赠送一套三枚公章）；所有涉市场准入行政审批事项实行“证照分离”；确保清单之外无政府定价收费；压缩水电气报装办理时间等。法治环境方面，建立“政府承诺+社会监督+失信问责”机制；政策承诺和签订的各类合同100%兑现、履约；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结案率达到90%以上等。

2019年中国农村网路零售额达1.7万亿元 六年扩大8.4倍 台湾 新浪网 5月12日报道，中国商务部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农村网路零售额从2014年的1800亿元增加到1.7万亿元，规模扩大8.4倍。其中，农产品网路零售额高达3975亿元，同比增长27%，带动300多万贫困农民增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目前中国农村网民数量已突破2.5亿，网购成为农民生活的常态，越来越多服务和商品通过电商进入农村。疫情期间，农村电商平台的作用进一步凸显。针对产业供应链水平差、物流成本高、人才缺少等农村电商目前存在的问题，今后官方将采取多方面措施予以解决，包括加大对返乡的农民工、大学生和返乡的转业军人等培训力度，打造农村电商队伍；引导农村商贸企业与电商深度融合，支持流通企业在农村地区开展第三方配送服务，建设线上线下融合的农村现代流通网路。此外，中国还将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共同配送体系，搭载消费品、农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配送，降低物流成本。

中国“抗疫答卷”彰显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香港 凤凰网 5月10日报道, 5月8日,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 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再次证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着优越性, 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 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了我国在短期内取得抗击疫情重大战略成果的成功经验, 为我们坚定制度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

本期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仅供高层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 吴健涛

本期编辑: 何楚龙

校对: 何楚龙

地址: 城站路 85 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 2823087

编辑日期: 2020 年 7 月 20 日